

初中學生文庫

曾國藩治學方法

編者 胡哲敷



中華書局編印

民國廿四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三版

初中學生
會國藩治學方法(全一册)

實價國幣壹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哲敷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自序

風習窳陋，國勢陵夷，至今日而極矣。民生憔悴，飢寒塞途，亦至今日而極矣。強者流於萑苻，黠者競於閹媚；天下滔滔，以獲利相尚，以附勢相矜，鑽營欺詐者爲智爲能，樂業安貧者爲庸爲妄。憂世之士，怒焉傷之，皇皇然奔走呼號，謀拯斯民而濟斯難。於是有所謂吾民篤於保守，無以躋世界文明之域者，則欲舍棄吾國固有文化，而盡取他人之長，以濟吾短。雖亦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力竭聲嘶，亦未足以挽頹風而移末習。繼之者乃曰：復興民族，首在闡揚舊有文明。凡前人之塵垢糝糠，莫不捨爲救國大道，救國之聲盈於耳，而國終不救，夫豈救國之術猶未備歟？其亦倡導者未得其宜耳！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高談理論而不切於實際，或舍其本而趨於其末，或徑徑於一枝一節而遺其大體；甚者斤斤於一、二名詞之爭論，而未嘗實事求是，身體力行，則術雖至善，亦無補於絲毫。傳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其是謂乎！

今之社會，無中心標準之社會也，上至國家禮法政令，下至鄉曲小民之一行一動，莫不人自爲之，此猶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於今之世乎？往者吾人猶侈言中國之大，何至滅亡？今者日蹙百里，已在亡國道

上趨其行程。於斯時也，而猶酣然以嬉，渙然以處，空唱一二名詞，爲裝點門面之具，而無堅苦卓絕之真精神以繼之，則臺灣朝鮮之續，在目前耳！是故今日之務，在力挽頹風而轉移習俗。雖曰茲事體大，非一二人之力之所能勝，然而風氣之成，則又往往經一二人之倡導，而全國靡然相從，卒收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清之會國藩氏，殆其人歟！會氏值咸同之際，社會頹唐，百端傾欹，殆無亞於今日，賴其力行倡導，而風氣爲之轉圜，雖爾時外患未熾，元氣未凋，國力尙未喪如今日，要非以彼堅苦卓絕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則當時情勢，未可知也。故會氏之事業是非姑勿論，其堅卓誠信，苦心孤詣，愛民恤才之偉大胸懷，則夔乎尙矣。是則本書之所由作也。

夫會氏以書生而當天下大難，肩天下大任，納一世於軌物，而始終勿懈，無稍變異其書生面目者，今之世有幾人耶？會氏之自勵也，曰勤與儉。謂勤可以生明，儉可以養廉。其待人也，視人之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彰也；急公家之難，若己之憂，惟恐其不去也。於時人才輩出，各獻所能，彼則培養提攜，無所不至。嘗謂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其胸懷器量，爲何如乎？是故轉移習俗，匹夫匹婦，與有責焉，而況肩政教之責者乎？人人以轉移習俗自任，人人懷堅苦卓絕之心，樸質諳練，洗淨浮華，凡望之於人者，皆先行之於己，則民之從之，猶水就下，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假令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則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然則今世之士，往往倡導不遺餘力，而收穫甚尠者，蓋亦有由矣。

曾氏之學問文章，載明其全書之中，既風行於世矣；吾乃不厭駢枝而爲此者，欲使學者以短少時間，得知曾氏爲學精神之梗概。且知成大事者，莫不由於銖積寸累，堅苦力行。苟因此而能稍有補於今之士氣，則本書望外之穫矣。

曾國藩傳略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生於清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公歷一八一一年。他的祖籍原在湖南衡陽，清朝初年，有名孟學者，始由衡陽遷居湘鄉，遂爲湘鄉人。孟學四傳至玉屏字星岡，便是國藩的祖父。星岡爲人，篤實勤謹，凡事皆具有規模，曾氏家道之基，完全創立於星岡公之手。星岡生竹亭，鼎尊、驥雲，鼎尊早卒，竹亭生五子，長卽國藩，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甫，次國葆，字季洪。國藩稟性樸質篤厚，不尙虛華，少時器宇卓犖，狀貌端重，五歲讀書，九歲讀畢五經，可以執筆爲文，因此他最得星岡公的撫愛，而他腦筋中，留得祖父的印象亦最深。所以後來他立身爲人，一舉一動，都隱隱是承襲祖父的規模。

道光十四年，國藩鄉試得舉人，詩文之名頗著於鄉里；不過此時所謂詩文，僅時文試帖詩之類，不足語於學問。次年他到京師會試落第，因卽留在北京讀書，自是之後，才算切實的做真實學問，窮研經史，留心經世之學。在京住了十幾年，一方面京師人文會萃之區，相與往還者很多有學問的人，便於磋磨研習；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與他一個結識天下賢士儲才待用的機會。同時他又從善化唐鑑講求爲學之方，

唐爲程朱派的學者，曾氏義理學的基礎，便建築於此時。計此十餘年中，他自己立身爲人之道，詞章義理之學，都很有些根基；而又廣結許多師友，後來事業上的助手，大半都是在此時認識清楚的。他在京師，一面專心研讀，一面又參與過幾次會試，後來清廷給他做禮部侍郎，其地位略等於今之次長，原是一個清閑的地位，仍得以大部分工夫，在學問上講求。咸豐二年，國藩母親死了，乃由京請假回籍治喪，在籍不多時，而太平軍起，國藩奉清廷命，在湖南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保衛地方。

先是清廷自鴉片戰敗之後，種種腐敗，完全暴露，割地賠款通商，頗激起人民的公憤。而廣東一帶，又值連年荒旱，上下官吏類皆庸闇無識，估權攬勢，以殘酷搜刮，粉飾太平爲能事；人民水深火熱，無以爲生，洪秀全等乃於道光三十年起義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稱太平天國，以民族革命相號召，采分田授產制度，標榜天主教義，人民風起雲湧，爭相附從。是時廣西巡撫鄭祖琛，老朽昏庸，因循畏事，太平軍初起時，祖琛一味掩飾，及聲勢漸大，始張皇入奏，而事已無可奈何。提督向榮，都統烏蘭泰，賽尙阿等，見匪盜四起，太平軍尤所至無敵，頗有應接不暇手忙腳亂的氣象，而向榮、烏蘭泰又常鬧意見，坐令數十營大軍，處處擱淺，予太平軍以從容佈置的機會。然太平軍亦不能聯合兩廣的匪盜而成一大勢力，不得已乃於咸豐二年二月，率其老弱男女不及一萬人，由廣西轉入湖南。是時湖南官兵久疲，太平軍長驅北上，而湘水正

漲，順流而下，指日可抵長沙。清廷大懼，江忠源、羅澤南、王鑫等，以地方團練，與總兵和春，在長沙與太平軍相持，向榮亦自桂林追至，激戰三月，長沙未破；太平軍乃夜造浮橋，渡湘而西，破益陽，渡洞庭，大破岳州。岳州城內貯有吳三桂所遺軍械，職位甚多，悉爲太平軍所獲。搜擄倉庫，估舟五千餘艘，蔽江而東，所過城鎮，望風披靡。至咸豐三年二月，不過一年之間，太平軍竟佔了道州、桂陽、郴州、醴陵、岳州、武漢，再沿長江，順流東下，陷取九江、安慶、蕪湖、太平，而定都於南京。

我們翻開地圖看看，太平軍所過之地——自廣西至南京——途中遭挫折而未能奪得者，惟長沙一處而已。長沙之所以如此堅強，完全得力於地方團練。太平事起，曾國藩正在家守母喪，羅澤南、王鑫等，力請曾氏出來主持地方團練，曾清廷亦降旨命國藩在鄉就近幫辦湘省團練。國藩辭以母憂不肯出，且言書生不知兵，其友郭嵩燾曰：「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經從戎，古之制也。」其弟國荃亦力勸之，國藩乃投袂而起，治軍力主嚴明，常以岳武穆「不愛錢，不怕死」一語自勵；但是此時兵政廢弛，土寇蜂起，敵衆未至，一夕數驚，地方官每畏蕙養癰，國藩則先整頓軍中紀律，十旬之中，戮二百餘人，一時謗讟四起，至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曾剃頭」，意思就是說他好殺人罷了。國藩置之不理，勤加訓練，湘團遂稱勁旅，湖南境內漸次肅清。又奉命募爲官勇，出境剿敵，他便仿明戚繼光

成法，束伍練技，編爲湘勇，令羅澤南、王鑫、塔齊布、鄒壽璋、周鳳山、儲玖躬，及其弟國葆等分將之，是爲湘軍陸師編制之始。翌年——咸豐三年，又用江忠源及編修郭嵩燾等所建水攻之策，購造兵船，編成水師，以成名標、諸殿元、楊岳斌、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褚汝航、夏燮、胡嘉垣、胡作霖等分統之，是爲湘軍水師編制之始。聲勢漸漸浩大了。

太平軍所過之地，只是姦擄焚殺，並沒有政治上的設施；雖然從廣西一口氣跑到南京，裹脅民衆百餘萬，但是他們所破的城鎮，往往不多時間，仍爲官軍收復。迨定都南京之後，始分兩路作大規模的出征，一路是由揚州出皖北，經臨淮鳳陽而入河南，攻山西，以襲京畿；由丞相林鳳祥、吉文元、主將李開芳等領之。又一路是沿江而上，經安徽之太平、蕪湖、安慶，攻江西以爭長江上游；由豫王胡以晃、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領之。是時清廷主要軍隊，則有欽差大臣琦善所統直隸、河南、陝西、黑龍江馬步各兵，由河南信陽馳抵揚州，號爲江北大營，向榮追太平軍至江寧，屯孝陵衛，號爲江南大營。外面看來，清軍是很壯盛了，實則內容都是些京旗綠營之兵，老弱驕惰，久已無用，一遇勁敵，直如摧枯拉朽，風捲殘雲。雖江南大營得張國樑等之助，得維持七八年之久，然太平軍得在南京支持十四年，亦未常不是向軍老弱無能的表现。是故太平軍雖受清軍兩路夾擊，而其兵鋒之銳，迄不爲之少減。林鳳祥等北路之軍，既以半年之間，橫行江蘇、

安徽、河南、山西四省之地，轉戰四千五百餘里；而胡以晃等南路之軍，亦以咸豐三年，先攻安徽桐城，破集賢關，再陷安慶，攻九江湖口，進圍南昌。江忠源等屢戰未下，飛書國藩告急。國藩遣郭嵩燾等，率湘勇千二百人，楚勇二千人，營兵六百人至，羅澤南亦率子弟鄉人自成一軍以偕。南昌之圍始解。太平軍見軍勢不利，乃回軍沿長江而上。次年春，太平軍水陸兼進，直破黃州。清將吳文鎔戰敗自殺。武漢等處，望風瓦解。國藩自率水陸師由長沙北進應援。是時太平軍氣最盛，而國藩水師初出洞庭湖，遇大風，連壞數十艘。陸師至岳州，一戰又不利，回走長沙。太平軍乘勝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出間道襲陷湘潭，踞長沙上游。國藩自督戰船四十號，陸勇八百名，擊太平軍於靖港市。時西南風大作，水流迅急，不能停泊，爲太平軍所乘，水勇潰散，戰船或被焚，或被虜，幾乎全軍覆沒。國藩自憤成師以來，一出卽失利於岳州，又慘敗於靖港，痛恨之餘，乃投水自殺，爲幕客章壽齡援出。而國藩終以事不可爲，遂草遺疏，祕密的把自己後事都辦妥了，正準備自殺，却好塔齊布等大敗太平軍於湘潭。國藩聞之大喜，乃益遣水師往助。八月之間，水陸十戰十勝，遂復湘潭。由是乘勝分兵三路，以提督塔齊布、道員褚汝航、知府羅澤南爲中路，趨岳州。貴東道胡林翼爲西路，趨常德。江忠源之弟知府江忠淑、直牧林源恩爲東路，趨崇陽通城。太平軍乃棄常德，走岳州，復走湖北，湖南境內肅清。國藩又與湖南巡撫駱秉章、湖廣總督楊霽、荊州將軍官文等所遣各路兵，略定湖

北。清廷聞之，命曾國藩署湖北巡撫。國藩以母喪未除辭，乃以兵部侍郎銜領兵攻戰。時北路太平軍亦漸次爲僧格林沁、勝保等所破，林鳳祥、李開芳皆被擒不屈而死。清軍始漸有起色。

兩湖粗定，國藩爲直搗金陵之計，進圖江西，圍攻九江。惟其時蘄州以下，西自九江東至饒州、廣信，所在皆有太平軍足跡，而德化、小池口、湖口諸濱江要隘，爲入皖門戶，尤太平軍之精銳所聚，石達開在安慶，遙爲聲援，皖贛形式，異常鞏固。國藩遣蕭捷三率水師越湖口，入鄱陽湖攻姑塘，湖口太平軍則造浮橋連接兩岸以封鎖湘軍。湘軍水師半在江，半在湖，有外江內湖之別，石達開自將禦國藩軍，擲火燒外江戰船數百艘，奪國藩坐船，國藩水師大潰，馳羅澤南軍以免，憤欲自刎，澤南止之。石達開又以清軍上游空虛可乘，因命秦日綱等進攻湖北，於是武昌已定而復陷。疆吏又畏葸莫敢攖其鋒，太平軍復攻江西。咸豐五年間，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幾全爲太平軍所有。當九江、武昌戰事最激烈時，名將塔齊布、羅澤南皆先後陣亡，亦可見此時兩軍肉搏的情形了。

澤南既死，胡林翼分四千人令國藩弟國華統之，往救九江。既而國藩之父竹亭於咸豐七年二月死於里第，國藩、國華自瑞州奔喪，國荃自吉安奔喪。時國藩所經營者，以水師爲一大端，有戰船五百餘號，礮二千餘尊，他請假回籍之後，就把這件事保薦楊岳斌與彭玉麟兩人擔任，其他餉糈及陸軍諸事，則由官

文、胡林翼主之。而時正江西軍事吃緊的時期，故清廷只准他三個月假，他卻要堅請在家終制。後來因爲事勢的逼迫，國荃於是年秋先銷假回任，次年夏四月，國華與李續賓等收復九江，秋八月，國荃收復吉安，石達開竄浙閩邊界，而湖北、江西之太平軍乃漸漸蕩平。

咸豐八年秋，國藩膺清廷之命，復出料理軍務，由武昌歷九江、湖口，以達南昌。先是官文、胡林翼會籌東征之策，陸師渡江先皖而後及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南京。以圖皖之事，屬之李續賓，疏請加巡撫銜，專摺奏事。時太平英王陳玉成主皖事，既陷廬州，乃於距廬州九十里之三河，屯糧械，築大城，環以九壘，防守甚嚴。續賓既下桐城，遂進攻三河，大戰破之，九壘皆下，而所部傷亡亦衆。玉成暨侍王李世賢，糾合捻匪首領張樂行自廬州至，抄續賓後路，四面圍裹，愈集愈厚。續賓知事不可爲，夜乘躍馬入太平軍而死。曾國華及諸弁員死者六千人，湘軍精銳殲滅殆盡。國藩聞之大懼，深恐湘軍從此不能復振。會是時江南大營爲李秀成所襲，提督和春、張國樑皆戰沒。和春督師江南，張國樑幫辦江南軍務，東南半壁，倚如長城。國樑謀勇兼優，數年以來，規畫江寧，自謂克復在指顧間，乃兵餉大權，爲和春所掣肘，以致援絕力竭，皆捐軀以死，江南大軍三百營，悉爲太平軍夷爲平地，清廷聞之大爲震動。

道光以來，滿人的腐敗無能，已大白於天下，至咸豐時，始有文慶、肅順等人，稍稍覺悟。文慶爲滿洲大

學士，在內閣常密請破除滿漢藩籬，不拘用人資格。欲辦天下大事，當以用漢人爲重，彼皆來自田間，知民疾苦，熟諳情僞，豈若吾儕未出國門一步，嘗然於大計者乎？肅順在當時，驕恣暴戾，人莫不切齒罵之，然而主用漢人，到是他最努力。他常說：滿族中無一人可用者，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倚重漢人不可。是時曾國藩、胡林翼等之握兵柄，肅順尤力主之。每與人言會國藩之識量，胡林翼之才略，皆彼素所心折；故雖祁雋藻、翁心存兩大學士之舢舨齟齬，齟齬至謂國藩以匹夫居鄉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而主志終不爲之搖奪，肅順蓋與有功焉。然而話雖如此，清廷究不欲以優越地位畀予「匹夫」。國藩治軍七八年來，轉戰於兩湖、江、皖等省，皆以兵部侍郎資格，與地方大吏有主客之勢；雖每次打了勝仗，清廷總以「會國藩調度有方，著交部從優議敘」幾句刻板文章，予以安慰，從未以實權相予。自江南大營爲太平軍所夷，兩江總督何桂清遁走，江蘇巡撫徐有壬，浙江巡撫羅遵殿俱死於難，眼見東南大局，土崩瓦解，始於十六年六月詔授會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於是事權歸一，國藩乃保薦左宗棠專任浙事，李鴻章專任蘇事，會國荃圍攻安慶，而胡林翼撫湖北，沈葆楨撫江西，晏端書謀餉粵東，皆聯絡一氣，而餉有所出，呼應皆靈，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皆從。

國藩既膺兩江總督之命，乃以圍攻安慶之師授與國荃。自率軍進駐安徽南部之祁門，以固吳會人

心，兼壯徽寧聲勢。十年十月，太平侍王李世賢悉衆圍祁門，分三路進攻；一出祁門東，陷婺源。一出祁門西，陷景德鎮。一出祁門北，踰羊棧嶺，直趨國藩大營。祁門危險萬分，文報餉路，幾於不通，有人勸國藩退師，國藩不聽，懸劍帳外，以自矢曰：「去此一步無死所！」堅忍數旬，至十一年正月，左宗棠擊樂平，六戰皆捷，乃通贛皖運輸之道，而國荃亦大破陳玉成於安慶，遺書國藩謂「株守偏陬無益，宜出大江，規全局。」國藩戰略，乃爲之一變。

國荃既克安慶，乃回湘增募新軍，轉回安慶。其弟國葆亦從兄轉戰，所向有功。國藩乃以規取金陵事付之國荃、國葆，又因蘇常迭陷，乃疏薦道員李鴻章才大心細，堪膺疆寄，令仿湘軍營制，自練淮軍，並選名將程學啓、郭松林以助之，命規復蘇州，自己則由祁門移駐安慶，指揮衆軍。計國藩此時所指揮者，除國荃、鴻章之師外，左宗棠規取全浙之師，江北多隆阿圍廬之師，李續宜援潁之師，江南鮑超進攻寧國之師，張運蘭防剿徽州之師，楊岳斌、彭玉麟肅清下游之師，與袁甲三、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揚州之師，馮子材鎮江之師，均奉命受國藩節制，軍政統一，戰事乃日有起色。

同治三年六月，曾國荃破金陵，戮洪秀全屍，章王林紹璋、顧王吳汝孝皆自殺，妃嬪投河死者無算，將弁三千餘人皆戰死，軍民十餘萬人爭蹈河死，屍填溢如橋，城郭宮室，連燒三日不絕。是時李鴻章亦於二

三年間，先後收復太倉、崑山、吳江、江陰、蘇州、常州等地，清廷聞之大悅，命廷臣議封賞。初咸豐死時，遺命有能克復江寧者，當封以王爵。至是廷議以國藩文臣，且非滿人，一旦封王，爲舊制所無，因詔封曾國藩一等侯爵，曾國荃、官文、李鴻章俱一等伯爵，其餘封賞有差。當江寧克復之際，國藩曾東下視師，惟不久又回皖垣；是年九月初一，乃率其全眷至江寧，改英王府。後由李鴻章改爲安徽會館今尙存在爲兩江督署。

時太平諸領袖雖相繼而亡，其餘黨則散佈於江北、安徽、河南、山東一帶，而爲捻亂。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其勢甚熾。四年四月，國藩奉命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乃會同淮軍各將領，設安徽、臨淮、江蘇、徐州、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四大鎮兵，互相遙應，呼吸相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匪勢漸漸清弭，而後起之淮軍，又頗得人。國藩很有退休的意思了，乃自陳病狀，請以散員留營自效。清廷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而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

國藩回任後，乃極力講求吏治，以蘇民困。又值是時正英法聯軍之役之後，外事日多，知篤守故常，不足以圖自強而禦外侮，舉凡勸農、課桑、修文、清訟、戢暴、去貪，以及整頓鹽務，開墾荒地，鑄造軍械，仿製輪船，派遣出洋子弟，莫不手定章程，規模具備。七年四月，詔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而以馬新貽總督兩江。他在直隸任上，仍舊繼續的講求吏治，勸學課農。是時清廷很感覺舊有軍隊，罷輟凡庸，不足以戢

亂，因令國藩在直隸以練湘軍之法，選練六軍，意爲捍禦畿輔之用，且爲刷新全國軍政之基。國藩乃條陳許多治軍之法，清廷均一一允從。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爲之一振，自國藩始。同時天津一帶，常開教案，而以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爲最烈。先是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爲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所獲，供稱受迷藥於教民。民間遂喧傳天主教遣人迷拐幼孩，挖目剖心爲藥料，又以義塚內屍骸暴露，俱視爲教堂所棄。同治九年五月，遂聚衆焚燒教堂，及拆毀法人所建仁慈堂，毆死法領事豐大業，殺傷教民男女數十人，又誤殺俄國商人三名，誤毀英美兩國教堂各一所，羣情洶洶，天津大擾。而曾國藩斯時正在病假中，清廷命亟往天津查辦。國藩到津，立意與通商大臣崇厚分謗，不獎士民義憤，蓋以粵捻初平，不宜與鄰邦構釁，又慮四國合縱，變生不測，於是力主和平，而使羅淑亞肆意要挾，必令府縣官及陳國瑞三人議抵，崇厚欲許之，國藩力持不可；而津民不知，大怨國藩，清廷諸人亦羣起掎擊。崇厚懼事決裂，奏言國藩病重，請罷免，清廷乃以李鴻章代之，實則國藩所辦，已有眉目，是年秋九月，仍由國藩與法使議結。定滋事人犯正法者十五人，軍流者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皆遣戍，陳國瑞訊與津案無涉，着免議。案既結，又特派崇厚前往法國道歉，事乃了結。了結之後，國藩頗以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自責，引爲一生憾事。當這件事初發生的時候，他本預備以身殉事，由保定將赴天津，曾與其二子信云：「余卽日前

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年病驅，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其後能於原案之外，無他損失，總算是已經出他意料之外了。

同治九年七月，兩江總督馬新貽爲張汶祥刺死，清廷詔以國藩調補兩江總督。此時國藩已經六十歲了，右目已經失明，又常患眩暈，因瀝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缺調理，清廷則謂『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目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所請另簡賢能之處，着無庸議。』是年底，國藩抵金陵赴兩江總督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公歷一八七二年，國藩卒於兩江總督任所。現在有曾文正公全集行於世。

曾國藩治學方法

目錄

頁數

自序

曾國藩傳略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學的意義與範圍

一

學的意義 學的表面 學的範圍

第二章 曾氏氣度與學風

六

曾氏的才質 謙恕勤恆的氣度 樸實諳練的學風 不主門戶 困知勉行 求闕

第二編 修養

第三章 修養的旨趣

一八

修養的意義 事業上的興趣 身心上的興趣

第四章 精神的修養

二六

精神常令有餘 治心——靜坐平淡改過 強毅之氣

第五章 身體的修養

四一

心身之關係 曾氏體質之衰弱 養生之法 養生之效

第二編 治事

第六章 治事的精神

五〇

立定規模 確守常度 誠拙的態度 宏大的器量 嚴密的考察 知人曉事 作育人才

第七章 治家

六六

曾氏先代的家風 曾氏承嗣的規模 消極的防止 積極的倡導

第八章 治軍

七八

清時將士之腐敗 曾氏治軍之精神 將領應具之氣度 訓練士卒之方術 臨陣制敵之

策略

第九章 治吏

九四

正己 戢亂 察吏 勸學

第四編 讀書

第十章 讀書的先決問題……………一〇九

志大人之學 始終不懈的精神 明辨趨向

第十一章 讀書方法……………一二七

看讀寫作 專精一業 求明瞭勿求強記 分類筆錄

曾國藩治學方法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學的意義與範圍

中國從前學者，常會發生一種錯誤，以為做學問就是隔絕塵世，關起門來讀書。因此書本之外無學問，書本之外無世界。前輩先生往往讀書數十年，而不解世事者，甚或出大門而不知東南西北者，都還是書齋裏的本色。就是宋人在那裏喊：「學者學爲人也」的口號，似乎是與世間相接近了，但是他們日日在那裏尋孔顏樂處，仍舊未免語句上的摸索，結果不過多刻幾本語錄，多教出幾個同樣沒用的生徒，實際與古人爲學意義，相去尙遠。按說文駁篆文省作學，覺悞也，從口，口尙矇也，白聲。段注曰：覆也。尙童矇，故教而覺之。吾謂凡所不知不能者，皆謂之蒙，經他人之教，然後豁然知之能之，便謂之覺。故學字有提示倣效之義，先生拿過去的文化積累，和他自己的造詣成績，提示學生，學生則憑其良知良能，以倣效，以覺悟，以知類通達，以化民成俗。學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學

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借過去的文化，啓發後人的蒙昧，固然也未嘗不有聰明特達智慮過人的人，似乎是可以不學而能，然而一人智力，成效總是很少，而所謂化民成俗者，是要使人民於不自覺間，變化其心性，改易其習俗，而趨於一軌，所謂納民於軌物，這是何等偉大的事業！豈一人智力之所能勝？故一方面要孜孜不倦的去學，一方面還要急急的教百姓去學，然後化民成俗的大業，才有希望。在這種學的空氣中，自然不是終目的自己抱着書本教，百姓也終日的抱着書本子去讀死書。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爲問使自得個什麼？就是要教百姓明瞭五倫之義，人心皆有，不學則蒙蔽而不能通達罷了。孔子教弟子，亦是『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知古人之所謂學，須在事業上表現出來，才見得是真學問；後世號稱做事業的人，往往不學無術，卑污苟且，而號稱做學問的人，又往往死於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隸，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學問和事業分做兩截。

往者已矣，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爲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二人都是以書生而克平世亂，都是在千辛萬苦中，把學問事業，磨練成功，都是戎馬倥偬之間，讀書

爲學不倦；不過王守仁天資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爲學途徑，多偏於上達一方面，於下學功夫，則言之頗少。曾國藩爲篤實一路的人，處處腳踏實地，故其爲學途徑，最合於下學之門。陽明之學學之不善，還會發生毛病；曾國藩的學問，則無論如何，都不會發生弊端。高明的人應該走這條路，遲鈍的人也應該走這條路，下學的工夫如此，上達的工夫亦不過如此。因爲他對學問的見解，不與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體力行的做出榜樣來，這便見得他的真學問。他說：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道光廿三年六月六日致諸弟

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

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大學之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

這是他對學問的見解，能把書中之事，處處體貼到身上去。照此處所引第一段，好像他所謂大學問，只在孝弟兩字。看第二段，他解格物誠意，然後知我們隨時隨地，都應該在學問陶鎔中。讀書固然是在做學問，即行止坐臥，亦即是在做學問，大概學問之事，原無定項，居家則將家中做到藹然有恩，秩然有序。居國家天下，則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悅遠來，推而至於爲農爲圃，爲工爲商，各思慎其職而敬其事，便是在做學問。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不違仁便是時時在做學問。朱子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都見得雖在造次顛沛之間，而爲學不輟。不但如此，還要能在職業的本身

與環境的本身，去尋求學問。如前所云，農圃工商，就在農圃工商中去求學識，求進益，處困窮的環境，不但能不怨不尤，並且能樂道不渝，處富貴的環境，不但能不驕不泰，並且能謙禮下人，如此一一做到了，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學的性質既如此廣大精微，無所不在，其範圍將如何規定呢？姚姬傳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曾氏引申其義曰：義理一門，在聖門爲德行而兼政事，詞章則聖門言語之科，考據則聖門文學之科，此曾氏聖哲畫像記之言，蓋以說明姚氏之言耳。在他的日記中，則謂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四者之中，義理一門，自然尤爲學問之本，立身之基。我以爲他生平成功多得力於此，而他生平用力之深，亦大半在此。當他三十二歲在京城充國史館協修官時，他自訂課程十二條，就見得他爲學的道路與身體力行的精神。其十二條中之重要者，摘錄如左：

一、主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一、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一、讀書不二 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務外爲人。

一、養氣 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一、日知所亡 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一月無亡其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喪志。

這個課程表，他終身行之，無大更變；所以他的成就，亦正能如其所期。現在就其所成就者分類而詳說之，則可列爲三大部門：曰修養，曰治事，曰讀書。所以不依曾氏義理詞章經濟考據四種分法者，爲其言不甚顯豁，而於本書性質尤不相宜，實則修養卽曾氏所謂義理之學，治事則經濟之學，讀書卽詞章之學與考據之學。他生平所治之學，可以此三種盡之。他對此三種，都有深刻的研究，精細的心得，極具體，極簡易的治學方法。他所治學問的內容，雖然未盡適合於今日，但是他治學的方法，確在在足以爲今人模範，是以本書所言，完全重在他的方法，而不一一述其學術內容。

第二章 曾氏氣度與學風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我們既知略曾氏對學問的意義與學問的範圍，都有很精微的解釋，我們更要進一步去研究他治學的方法，故不能不先知他的氣度與他的學風。知得他的氣度，然後知他學問事業造詣的根柢；知得他的學風，然後知他的治學方法所由來。並且可以明白何以頌

其詩讀其書還不够，定要加一個知其人大概不知其人的身世，徒讀其詩書，恐怕就時時要感覺書中言論，像是突如其來。譬如不明白荀卿的個性，乍看他書，就會疑惑他何以要主張性惡，何以開口就是人之生固小人。明白了他的性情行事，然後再看他書，就毫不奇怪了。因此我們在研究曾氏治學方法之前，定要有本章的敘述。

曾國藩的才質，並不能算是聰秀。老實點說，他的確是一位很拙鈍的學者，不但在他的日記、家書中間，常常發現他自己說他是天性魯鈍；就縱或他自己不說吧，我們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齊家讀書諸事，幾無一處不見得他魯鈍或拘拙。魯鈍與拘拙並不是壞事，高明與聰穎，亦並不是好事。可以說曾氏一生得力處，就在他自知魯鈍，乃勤勤懇懇，孳孳矻矻，按部就班的去走下學上達困知勉行的道路。平常人壞處，就在自以為有幾分小聰明，於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凡事好高騖遠，而不腳踏實地的去做，所以結果到還是魯鈍拘拙的人成功，以聖門學生而論，子貢比曾子聰穎得多了，然而孔子之道傳之曾子，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就可知孟子惡智，老子尚拙的深意了。我所謂曾氏的魯鈍拘拙，就是因為他的天性是篤實敦厚一路的人，而自己又深察平常人所謂聰明的危險，所以自己不知不覺就會做到魯鈍拘拙一路上去。然而拿他學問造詣和事業的成功來說，就要格外使我們深服他精神的可畏。另一方面說，假如我們自己

感覺自己的天資不甚高明，也就不必自餒；即自命是有幾分聰明的人，尤應該時自慊勵。

因為他是誠篤一路的人，所以要看他的氣度，也該以此爲出發點。他氣度的表現，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一是他自己的立身爲人，二是他的待人接物。在敘述他這兩方面之前，我先引薛福成的一段話，可以概見這兩面的大要。他說：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爲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暑。久爲衆所共見，其素所自勵而勗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爲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爲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其數十年逐日行事，均有日記，……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強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見庸齋文集

在這一段中，我們已可見得曾氏氣度的大略。關於他自己立身爲人的，則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

外，立心甚恕而不求備於人，專務躬行，進德尤猛，不畏難，不取巧，雖禍福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關於待人接物的，則論功則推己讓人，任勞則引爲己責，氣度是如此的恢宏闊大，安得不爲一代中心人物的中心？薛氏在他部下多年，我們相信薛氏的道德文章，當然是「汗不至阿其所好」。

他處處表現着腳踏實地的精神，所以他時時有猶恐失之的感覺。我們看他把日常功課立爲課表，每日照上面做，更於每晚做日記，自認這一天言論行事得失，還恐怕有懈怠疏忽的地方，又常做出許多箴言，對聯，或者標幾個字在自己腦筋裏，做立身行事的標準，使隨時隨地有所鑒戒。這是翻開他的全集，處處可以見到的。我們統觀他的言論行事，可說是洗淨浮華，樸實諳練，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若拿幾個抽象的名詞來表白他這種氣度，則謙恕勤恆四字，很可以代表。大概謙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氣度，勤恆二字，則是他終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嘗說：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莫不善於矜。見雜誌又曰：「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見日記即此數語，可見得曾公氣度之一般了。

他的氣度是如此，所以造成他樸實諳練的學風，他覺得學問這件事情，是應該公之天下，不應該有主觀成見參雜其間，更不應該互相標榜，以成所謂門戶之見，在他家書中曾經說過：「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闡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

這幾句話並不是偶然因其弟信中之言而爲此順便的解答，他對學問素來就未主張過門戶，他覺得各家的學問，都必有其長處，若能去短取長，則不但無門戶相標的必要，並且有兼取衆長的好處。這種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的態度，在清朝學者中，就不大多見。乾嘉年間的那些大師，自號漢學，於是醜詆宋人理學，不遺餘力，間有講理學者，則又或標程朱，以攻陸王；或標陸王以攻程朱，在他看來，都是不免於太自隘了。在他所著聖哲畫像記一篇之中，頗可以見得他對於各門學問都有兼收並蓄博采衆長的精神。他中間有一段說：『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攢有宋五子之術，以爲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這是他顯然的不贊成漢學家與宋學家的互相攻擊。他覺得這樣互相攻擊，直是把自己看小了。因爲他是要兼綜漢宋之長，以成文實並茂的學問，故不欲左袒以附一闕。且不獨於漢宋之爭爲然，於程朱陸王之爭，亦復如此。唐鏡海是曾氏的先生，著清朝學案小識，專尊程朱，而排陸王，於是就成一部著名的壞書。曾氏就不如此。他說：『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源？陸子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王陽明宗陸，當湖陸隴其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

不遺餘力；當湖學派極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覆潁州夏教授書 以此態度，比之於唐鏡海的拘墟狹隘，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不但如此，在他日記中，還有這樣幾句話：

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僞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觀此數段，則知曾氏不但於漢宋之爭，朱陸之爭，認爲非學者應有態度，且欲合上下古今諸子百家於一爐而共冶之，僞者裁之，缺者補之，以成其廣大深淵，這種毫無主觀成見，納百川於一海的爲學精神，乃爲曾氏治學方法中的主要條件；故欲論曾氏的學風，不可不首先知道他這種博采衆取，不主門戶，不尙標榜的氣概。

其次在他學風中佔重要地位者，就要算他那困勉的工夫。他嘗說：『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又曰：『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懈，則百處懈矣。』這幾句話，可算是他爲學精神的綱領。他所以能如此艱苦卓越，不稍弛緩者，正因爲他把學問目

標立得很遠，故日求赴之不敢荒懈，蓋卽莊子所謂：「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意了。我們看他的座右銘『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不問收穫，第問耕耘。』卽可知其所期之遠大，與用力之不可以不勤勉了。且人非生知安行者，凡事總得帶幾分勉強，才能有所成就，常人之畏難苟安，就是不願意勉強。不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矣。」所謂可觀，就是說雖是一件小能小藝，都必定要經過若干勉強力行，然後才可以有這小小的成就。曾氏對困勉的境界，體會至爲深透，茲錄數段如左：

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慢，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家訓致紀鴻

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自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然，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

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己從人，傲情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核太甚，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見雜著
勉強

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見雜著
勉強

這幾段發揮困勉的意義與效益，可謂淋漓盡致；並且他這言論，並沒有一句高遠的理論，都是很平易的事實，而且句句都是他自己經驗過來，有方法，有步驟，只要按照他這方法去做，不會沒有效益的。怕的就是稍遇困難，就不願勉力前進，就成爲中道而廢。於是成者愈成，止者愈止，最後乃變成相懸甚遠的兩樣人。我們看他教紀鴻用困勉工夫的方法，是何等親切？大概宇宙間無論那一種學問，絕沒有不須勉強力學就可成功的；縱令有了，這種學問的價值，也就有限。假如這一門學問，是可以不須勉強學成，如目之能看，耳之能聽，則根本這種機能，就不必稱爲學問，既成爲一種學問，必其中須要若干心力，若干困難，且必以我精神勝過困難，然後庶乎有得。勝過小困，則有小得；勝過大困，始有大得。試看古今中外之大學

問家，那一個不是勝過重重疊疊的困難，然才有所成功。曾氏所舉寫字之例，就是一個榜樣。他說：『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這幾句話，只要我們曾在任何一門學問上用過功力，都會領略得到；不過我們當這個困的時期，是怎樣的情形呢？勉力前進呢？廢然摧沮呢？當然有很多的人是勉力前進，以求達他最後的目標，但恐怕畏難苟安，萎縮不前者，定亦不在少數。所以他接着就說：『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看他用這一個「熬」字，就可知道這個關頭，確不容易過去，苟沒有堅忍的耐心與精力，恐就難免要被困難阻撓了吧。而且這個困難，還不只一次，雖然熬過一次，便有少許進步，但是方見進步，却又有第二次的困難，定要經過若干次的「熬」，若干次的「奮」，然後才有亨通精進的境界。這若干次的困進，就不是一般淺嘗輒止的人們所能打過。所以他說：『打得通的，便是好漢。』這一段他描繪困勉工夫，最爲透澈，可以說是他自述其學問心得，以教其子，也可以說他在發揮學問上必經的道路；這種困勉的工夫，不但是他自己凡事皆用，並且教導子弟，教導友朋部屬，都是這一套法門。因爲他認定學者自讀書以至於復性，做聖賢豪傑，都不可舍勉強而聽其自然，所以困勉工夫，也是他學風中重要之一。

此外還有一種，也在他學風中佔有地位，就是求闕的精神。他因爲時時要戒驕傲，戒懶惰，所以時時

刻刻惟恐自己犯自滿的毛病，乃顏其居曰求闕齋，就是表示要求闕的意思。原來人的學問，到稍有造詣的時期，誠難免傲然自足，輕視他人，因此他乃處處存一個求闕的念頭；處處求闕，自然無形中就不會自足與輕視他人。這還是就消極一方面說；凡人能時時刻刻求自己的闕，則其進德修業，亦必較他人爲猛，這都是求闕精神的效益。然而他自己所謂求闕者，則完全出於臨深履薄之心，惟恐高而致危，滿而致溢，他全生的學問事功，都時時帶有這種惕勵之心。他自己嘗說：『余居京師，自名所居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勉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讐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見雜著悔吝參閱所著求闕齋記這幾句很可以概括他求闕的意義，這種意義，在他治家的學問上，表露尤多，是

以其教訓子弟，常以遷善改過，持滿戒盈爲務。他曾說：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致四位弟書

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咸豐元年七月廿八日致諸弟信

照這一類意思，在他家書和日記裏面，可算是觸目皆是。他有了這個觀念在心目中，所以不敢自是，不敢自滿，以養成他虛懷若谷的治學精神；這種精神，並不是可以虛偽掩飾做成門面的，更不是畏神畏鬼，迫於迷信的，苟其如是，則行之不能自然；且至大利害衝突的時期，就會顯現出很大的裂痕。他是完全由於心志遠大，目光遠大，且深信孟子「求在我」與「求在人」之意義，溶化而來。遷善改過，修德讀書，皆求之在我，且可久可大，而毫無扞格。積穀積錢，皆求之在人，且過眼煙雲，瞬即剝喪。雖然，此理甚明，常人皆可見到，然而非有深厚學養，即不能做到。曾氏係將修養事功讀書聯成一片，幾無時無地不是他研究學問的場所，無事不是他研究學問的資料，故他這求闕的精神，雖稍偏於個人的反省，與治家的儆惕，我亦認爲是他學風之一。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他的氣度是謙恕勤恆，而學風則爲不立門戶，困知勉行，與求闕。他的氣度

自然是他學養的成績，亦可以說他的學問事功，亦因他的氣度而更光輝充實；至於他的學風，則又爲他的治學方法根柢，請於以下各章分述之。

第二編 修養

第三章 修養的旨趣

修養這件事，可說是一切學術的出發點，雖然各人所學並不一致，但必經過一段修養工夫，這學問才靠得住。譬如說任何一種學問，總得具有恆心者，才能有所獲得，這恆心就必須養而後有。又譬如做學問的必具有一副好身手，然後才能運其所學，而為世用，這好身手就必須繼續修練才能成功。所謂養而後有，所謂繼續修練，就是最淺顯的修養。且人之為學，所以學為世用，苟不早具良好習慣，則一入社會，鮮有不格格不入，雖有技藝，亦無由表達了。故凡書本文字之外，心性行為上的良好習慣，身體器官上的良好技能，所謂養成健全體格，均非切實修養不會成功。且也，這些習慣與技能，苟毫無修養，則知識愈富，為害愈多，根本就談不到學問。社會進步，知識技藝，當然有極重大的用場，但是我們苟不把內心先養好了，則知識技藝，且無所容。是故我們先有了內心的修養，就好像備了一副舟車，有了舟車，然後可以容載許多穀物，沒有這副舟車，雖有穀物，將無所收束，勢將狼藉滿地，非但無濟於用，猶將感覺討厭了。所以學者身心的修養，確是一切學問的源泉。宋明理學家，就是因為感覺有一部分學者太舍本逐末了，以為知識

技藝就是學問，所以他們大聲疾呼，在那裏喊誠意正心，喊得太起勁了，又往往會矯枉過正，專門在誠意正心上面做工夫，而忘了誠意正心之後，還有治國平天下的事業；更有時會把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分成兩截，以為修身以上是一事，修身以下又是一事，好像一個人要派若干年工夫去做修身以上的事，然後才能談到齊家治平的事。不知如此做去，非但不切實，並且很危險；因為修養而不切於實際，空空洞洞關起門來去做，自然有一部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如靜坐等；然若終其身都是空空洞洞，關起門來造車，出門就難以合轍。且人所最難制勝者，莫如名利關頭。空談屏除名利之見，是容易的，到真實名利來了，還能淡然翫置，不為所動，就要看真實的修養工夫了。所謂真實的修養工夫，我則以為最好方法是就事上去修練，不然，徒託空言，遇事即見痕跡，其原因就是因為離開事實去談修養，所以愈修養愈迂腐，離開社會愈遠，到最後他便專去做修身以上的一段工夫，修身以下一段的工夫就完全廢置了。如此做去，即使做得好的，號稱道德高尚，亦不過是靜的道德，病的道德，與社會無甚實用的道德，所以中國從前學者往往滿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之事者，就是出於此途。做的不好，所謂見獵心喜者，一到名利關頭，則前功盡棄，世人所稱為偽道德偽君子者，盡是出於此途。兩種毛病，都是因為修養時期，離開事實太遠的原故。

故吾人不談修養則已，談修養則必就事論事，才有實效，亦才有生趣。譬如我們日常工作，處處不苟，待人接物，時時謙和，一有苟且傲慢，便立自譴責，立自改悔，這便是修養的實效；故凡離開事實太遠而談修養者，都不免空洞而有流弊。曾國藩氏之學術事功，都能如此輝煌者，全因為他修養工夫的深厚，而修養工夫之所以能切於實際，就是因為他不落空，日常工作，遇事反省，遇讀書寫字就在讀書寫字上求修養，遇待人接物，即在待人接物上求修養，帶兵即在帶兵上求修養，從政即在從政上求修養，可算隨時隨事都是他修養的資料。他把修養，看做合於實際應用的事實，所以他的修養工夫，處處能有生發的興趣。第一是事業上的興趣，第二是身心上的興趣。

怎樣是事業上的興趣？因為他拿辦事當練習才能，修養身心的工具，所以他處處感覺事業上的興趣。事體順手，固然有興趣，即事體棘手，亦可借以磨練經歷，開拓胸襟。所以他說：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苟於嶢嶢者遇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

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被不祥。

這幾段都是他在辦事上得到的修養心得，這些心得都絕不是關起門來空談修養者所能夢見。大概他自己先立一個光明磊落的定見，然後收羅各方人才，順這個定見做去，然後再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至於艱難波折，則早在他預計之中，雖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因爲他相信只要自己果誠心，果虛心，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所共亮；卽未得共亮，而有毀謗，他也只問自己的心胸是否磊落光明，假如問心無愧，有可以自立之道，則毀譽皆聽之於人，不做鄙夫患得患失的態度。我們看他初起湘鄉的時候，因當時兵政廢弛，土寇蜂起，地方官畏葸養癰，曾氏則力主嚴明，十旬之中，戮二百餘人，一時謗讟四起，至有「曾剃頭」之稱，然而曾氏不爲所動，而卒成削平內亂之大功，這便是他沈毅之氣，始終不餒的功効。他何以能如此呢？我以他的祕訣，就在「一面」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一面能」忘機。」我們平常所以

債事，恐怕就因為不能耐煩的原故吧？因為不能耐煩，故遇棘手之際，則猜疑嫉恨之心，往往緣之而起。也許他人原沒有機心，倒因我先有機心而引起他人之機心，則事安有不敗之理？他之所謂「忘機能消衆機」，就是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的氣度。如此，可以說他是在辦事，亦可以說他是在借事以磨練經歷，開拓胸懷，更可以說因經歷胸懷之修練，而所辦之事，更能順理成章。這是因為修養工夫而得到事業上的興趣。

怎樣是身心上的興趣呢？大概提起修養兩個字，或者就會有人要認為是腐儒的口頭禪吧？誠然，不談修養則已，一談修養，總是一開口就是慎獨呀，主敬呀，誠意正心呀，把活潑潑地青年，幾乎要拖到墳墓裏去，才算是修養的功効；這樣安得不被人們認為迂腐之談呢？然而曾氏的修養旨趣，却不如此。他除了事業上的修養之外，常把最緊要的修養工夫，撮成幾項，再將工夫的境界與修養之實效，一一從自己經驗中敘述出來，使後生感覺修養這件事並不枯燥沉悶，而且易知易行，生趣勃發。所以我感覺得他所指示人的修養途徑，處處都與實際生活有關，而無絲毫玄遠空洞之病。他曾自訂修養日課四條，錄其大要如左。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

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俯不愧仰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事，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敬字切近之效，就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應徵，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業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生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

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宜信，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入之情，莫不好逸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身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用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這四條可以算是他的修養要旨，簡明切實，不但容易躬行，並且他還給人多少鼓勵。人能照此四條做去，豈但是處事泰然，抑且身心爽快，無時不在精神飽滿之中，用這飽滿精神去做事業，還會有苟且偷

惰的氣象嗎？他曾說：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他是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我們觀此可知他的修養工夫，完全是腳踏實地，全不蹈空虛口頭禪的毛病。

他又曾把一切身心修養，歸納到不恃不求上面去。蓋詩云：『不恃不求，何用不臧？』不恃不求，則一切行爲，皆無過失，修養之事畢矣。他說：『聖賢教人千言萬語，而要以不恃不求爲重。恃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恃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伴，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恃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恃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他把這兩件事，說得如此透澈，真是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人能把這兩件事常常在心裏提撕猛省，自然修養之功，可以自進。

本章既說明了他的修養旨趣，至其修養方向與方法，大概可從兩方面觀察，一精神方面，二身體方面，以下分兩章述之。



附錄曾氏恃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垂氣相廻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貌？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芳馨求椒蘭，盤固方泰俗，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怵。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有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神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股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愴？於世少人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第四章 精神的修養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人之所以爲人者，形體是一個軀殼，必定要有精神，形體才能發生效用。一旦精神完了，形體不但是全無效用，並且也決不能支持，所以精神是形體之主，把這形體之主，養得好了，形體自然動靜咸宜。淮南子曰：『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均，均則通，通則神，神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精神 這一段說明精神是人生本源，至爲透澈，所謂精神盛而氣不散。拿一句膚淺的話來說，就是精神飽滿而不外露的氣象。有了這個氣象，則視無不見，聽無不聞，爲無不成；沒有這個氣象，則不免於飛揚散漫，瞽亂荒遺，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就是因爲精神不能貫注而已。故必先做到精神盛而氣不散，然後才談到學問事業，古今聖哲在這一點上用的工夫，確不在少數，所謂存心養性，養氣存誠立大……都不過是要做這個內心的工夫罷了。

曾氏的學問事業，都有很驚人的成就。我們看他的日記，看他的家書，以及他與人相往還的書信中，處處見得他是毋怠毋荒，絲毫不苟。這全是因爲他有過人的精神，才能如此。而也就是他學問事業成功

的根源。在他日記中，曾說：『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他生平很歡喜讀孟子養氣章，我覺得他這幾句話，就是得力於養氣章中的境界。所謂於事則氣充，正是不餒的情形；心不散漫，就是「必有事焉」，就是前面所說的精神飽滿而不外露。因為他能精神飽滿而不外露，故能勤懇奮勉，不求苟安。再看那些苟安怠惰的人，總是精神不足的緣故。精神之所以不足，一方面是養之不得其宜，一方面是用之不得其當。淮南子曰：『耳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這幾句話正是說明精神不足的原因——養之不得其宜，用之不得其當，都在其中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曾氏怎樣養他的精神，和怎樣用他的精神，不可不先求他修養精神的一個綫索。我覺得他對精神的本體說，是要常令有餘，就精神的效用說，則求歸之於仁。怎樣把這兩種聯到一起以達到這個欲望，就要看養的方法，與養的步驟了。

修養精神，全是內心的；故凡所謂治心之道，懲忿窒慾，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都屬於精神的修養，在他學問中要占大部分的工夫，也是他生平學問事業的最得力處。所以在他全集中，尤其是家書與日記中，關於這類言論，載的特多，茲言其次第如左：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

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儉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繇繇，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而盎將。日記

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日記

人必虛中不着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着一物，心中別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別着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着也，無私着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日記

這幾段可以代表他精神修養的總綱。此處所謂治身治口，似乎是屬於形體；然而他係就禮以居敬，樂以導和方面立言，實根於內。他在消極方面，是要去其毒，防其患，慎言語，節飲食；但在積極方面，則有一

敬」字與「和」字做律身的準則。他因為單講一個「敬」字恐怕太拘謹了，太枯燥了，因而加上一個「和」字，生活上便可以加許多生趣。他曾說：「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矜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這就可以證明一個「敬」字，不免於呆板，甚至流到偽君子一條路上去；有個「和」字，就可以活潑和藹，出於自然。他平生氣象，很可以這兩個字包之，並且有此積極的修養目標，則消極的防範，不至於落空。所謂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心之賊就是忿慾一類的過失，心之牆子，就是積極方面的目標，也可以說就是此處所云之敬與和。更進一步，真實無妄，是心中牆子，作偽欺人，便是心中之賊。他所謂虛中不着一物，就是要把私心完全去掉，如太虛境界，然又不是完全着空，只是心中不要有私着，殆如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他指示我們的例子——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當見客便見客，心無著於讀書。這是再顯明切實沒有了。但是心如何能如此的受我們指揮，可以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呢？這便是靠我們修養工夫了。我嘗以為養心之道，很像飼養禽獸，必定要先把牠野性養馴服了，然後可向積極方面去指導牠有意識的動作。野性完全馴服了，是此處所謂至虛；能做有意識的動作，是此處所謂至誠。

以上所述治心之道，可算是他精神修養上的綱領；其細目如何呢？我以為可分三層來說：第一層是

靜坐，第二層是平淡，第三層是改過。茲依次述之。

靜坐這層工夫，是儒道釋三家共有的初步門徑。儒者所謂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道家所謂致虛極，守靜篤，都是把靜字看做學者最重要的工夫。至於佛家要求明心見性，更要先有靜的境界，然後才能達到。我們平常的精神，總是飛揚散漫，在此飛揚散漫的精神上，要去談學問，談工夫，談境界，談心得，豈不等於南轅北轍？所以我覺得不管做那門學問，沒有一副靜的精神，總不容易得到學問中的精蘊。現在所謂冷靜的腦筋，仍是靜的意味。必先具着冷靜的腦筋，然後可以鑑別自己的長短得失，不然便難逃主觀成見的遮蔽了；所以靜的精神，竟是一切學問的入門基礎。在未能達到靜的境界之先，只有用靜坐的方來訓練。我嘗說：我們這種飛揚散漫的精神，猶如一盆泥漿水，要想拿這一盆泥漿水去照物，只有把這盆水擺在那裏不動，慢慢待他把泥漿沈下去，上面便是清水，可以照物了。靜坐的工夫，就是要把我們心中泥漿——私慾沈下去，漸漸提掉，使他清能照物，便是把飛揚散漫的精神，漸漸訓練到靜的境界了。曾氏養心之法，當然也不出乎此。他說：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記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

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

記日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推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壞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日記

右引三節，都是說明靜字的重要，與靜坐的境界。他說：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我們驟然看去，似乎把靜坐這件事，看得太神通了；其實就是說人的精神，不能沈靜下去，則心總是散漫的，氣總是浮動的，

對事理不會看得清楚，自己做事也不會着實。甚至自己身體都不能保養得宜。他曾說：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然後知養心養體，乃至於做一切學問，都是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至其所謂心到靜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一大段的意思，無非要發明儒者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與道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這一點我則以為曾氏猶未免前人門戶之見，實則靜坐之理，至宋儒而大明，宋儒之所以篤信此道，甚至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者，完全是得之於佛道二家，儘可他們嘴裏喊着排斥二氏，但是暗地還是同他們往還很密，而學問方法——尤其是靜坐方法，與學問見地，亦確實受佛道不少益處。然而他們偏要喊出吾儒之道，怎樣廣大精微，抹煞人家長處，這是宋儒的淺陋。以靜字論，其本體上三家原沒有什麼不同，或者宋儒所得的境界，未能如釋道之精深則有之，定要在這當中，找出不同之點，以求尊重儒者，不但淺陋，且更穿鑿。曾氏此段之論，即未免於此，蓋猶宋儒之遺病也。

靜坐以外，他所期望精神上的，便是平淡的境界。平淡，我以為就是老子所謂淡泊寡欲。不能淡泊寡欲，外物便不免擾亂其心，心中就不平不淡，精神便要時時受累了。所以他說：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日記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

優柔饜飮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記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獸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記

在這幾段中，可以見得他所謂平淡二字的意義，與自己痛恨心胸未能平淡的情狀。可知常人胸襟不能廣大，全是物質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重。更簡單些，便是私慾營擾於心，使精神無安靜的時期，自然更談不到快樂。他所謂從敬靜純淡上痛加工夫，與所謂淡極樂生，都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有枯亡營擾之私，務使精神恬靜寡欲，不受外物之累，庶幾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然後可以日即於光明之域。

存着這個意念，做修養的規範，修養才不落空，才不至拘泥於物而無所適從，自己時時可以檢點自己的心境，果能平淡了麼？便是進益；自覺尙未能平淡，則尋究其所以未平淡的原因；或者是好名好勝？或者是好色好貨？尋得病根，然後就病根上痛下針砭，這便是所謂改過，實則仍是平淡修養的又一面。消極方面罷了。曾氏對改過很勇，他所以要立日記冊子，日日不稍間斷，爲的就是要能收得改過之效。我們看他全書中，其自怨自艾自責自認的地方多極了，他初號伯涵，二十一歲時，改曰滌生。他說滌者，取滌

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他又說：「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譽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於此可見他的改過精神了。凡他所作之銘聯箴言，及全書中所常見之格言警句單字等，都爲的是要借做提醒警惕的工具，卽是借做改過的針砭。茲舉其要者如左：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備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舊習，何必寫此冊？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澈底盪滌，一絲不散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奈何！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

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纏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以上各條俱見日記

凡此都見得他是常存省過之心，他每日寫日記時，就是自己與自己結賬之時，凡這一日的言行動作，都要在此時期做一個反省，見善則遷，見過則改，這是他立日記冊的用意，亦卽是他立志自新之大目標。他有了這個目標，故在積極方面則隨處立許多箴言，借以自警；在消極方面，則時時悔過，痛自猛省。在此種情形之下，假如沒有積極目標，則不但易於着空，甚或流於詐僞。他有他的修養目標，故能日益進步。我們所要效法他的，便是一方要具有正大目標，一方要具有這種勇於自責的精神。平常人若有人罵他欺世盜名，甘爲小人，以至不如禽獸，則必起而抗詈，認爲莫大之辱；然其行爲，乃真有欺世盜名，甘爲小人，以至不如禽獸之事實，則又時自掩護，終至小人之歸，此雖不欲承小人之名，而實具小人之實。曾氏勇於自責，謂不爲聖賢，便爲禽獸；其自待如此之嚴，故其改過毫無吝惜之心，而卒能磊落過人，達到其所期之目標者，其得力皆在於此。

以上所舉三種——靜坐，平淡，改過，是他修養精神的三項細目。在此三項細目之中，平淡二字又是一個中堅。靜坐是爲此中堅目標而用的工夫，改過是爲此中堅目標而用的克省工夫；故此三者，名雖爲三，實則一而已矣。一者何？就是要求有平淡的心境，以應世事罷了。我們可以說上述三項——靜坐，平淡，

改過，要算是他精神的本體，而施之於用，則他所謂強毅之氣。他嘗有兩個口訣：一個是「悔」字訣，一個是「硬」字訣。他述朱子之言曰：「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盛茂已極，各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謂貞卽硬字訣也。他說：「際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我以為這兩個口訣，實足以代表他的整個的修養工夫，與整個的立身爲人的精神。靜坐平淡改過，都是悔的工夫；強毅之氣，便是硬的氣象。此不但可以代表他的人生，且足以代表他的學問事業。他終其身謙謙自牧，便是悔的功効，以中等之資，而下學上達；以書生而削平大亂，是硬的功効。關於悔的工夫，除上述三項——靜坐平淡改過以外，他與其弟書內，曾切實發揮一段，茲錄如下：「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用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傲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

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這一段是他四十八歲時候的話，其得力處，則全在一個「悔」字，蓋惟能大悔，然後可以大悟，能大悟然後能發奮自強。他嘗說「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折辱時。」就可知他善用挫折機會，以圖悔悟，以圖自強，所以他的強毅之氣，確是高人一等。他說：

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尸坐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咸豐八年正月
初四致沅浦弟

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的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留爲可久可常，此外鬪智鬪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智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

然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成於汝。李申夫嘗謂余，樞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咬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沅浦弟

這幾段很可以代表他的強毅精神，而他整個的人生價值，也在這裏表現不少。他把強毅的界說，規定得很清楚，所謂強毅之氣，說高遠一點，就是孟子所謂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說淺近一點，就是浩然之氣的初步；所以他所謂強毅之氣，是建築在曾子之自反，孟子之集義，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的意義上面。強毅之氣，是以此爲出發點，故完全求之在己，不在勝人處求自強，而在自修處求自強。換一句話說，就是在勝人，而在自勝，能自勝者，乃是真強。孔子所謂克己，即是自勝的意思；顏子不貳過，就是能自勝的榜樣。不能自勝而求勝人者，則謂之顛預，則謂之剛愎，而內心必滿懷嫉妬與詐僞。照這樣做去，充其量也不過做到曹操、董卓，試問對己對人，究竟有什麼好處？他更明白告訴我們自勝的方法與門徑，要從勉強入手。我在第二章中，曾說勉強是他的重要學風之一，此處他以強制、強恕、強爲善，做養成強毅之氣的門徑，正

見得他學問工夫的一貫。平常人往往歡喜過苟且偷安的生活，所謂苟且偷安，就是不能自己勉強自己，如不慣早起便由着自己貪睡，不慣莊敬，便由着自己散漫，不慣勞苦，便由着自己安逸。……凡稍須用力者，均不自勉強，我們就可以斷定這人必成廢物；所以要想有所成就，不但要勉強自勝，並且要困心橫慮，忍耐磨練。——這種工夫的深淺與學業成就的大小，是成正比例的。現在國內大窮小窮，莫不感受經濟恐慌。青年求學，受經濟壓迫者，尤所在皆是，具有很好的資質，很大的求學決心，而為環境所逼，不能邁進，這自然是人生莫大苦楚；但是在無可奈何之中，這種窮的環境，亦未嘗不可資以利用。我們看經濟較裕的青年，往往嗜好浮華，與之俱裕，並不因經濟較易，更努力於學業，據我的經驗，到是貧寒的青年，努力的精神愈好；而能有所成就者亦太半出於貧寒。由此類推，凡挫辱困苦都是磨練人才之最好工具，就看能不能勝過罷了。你能勝過挫辱困苦而不為挫辱困苦所勝過，你便是好漢，你前途便多了一層造詣。如是一層一層積累多了，至最大挫辱困苦，常人所不能勝者，你也勝之裕如，你便成功一個大器。但是靠什麼力量，可以抵抗挫辱困苦而致勝呢？便是曾氏所謂強毅之氣。我們看他經過多少次的挫敗，而能一字不說，咬定牙根，徐圖自強，這是何等的強毅！何等的偉大！這種精神，我們應該時時取法於心，奉為圭臬的！

綜合他精神的修養，可以歸納成兩點：一點是心境平淡，——人我之際看得平，功名之際看得淡，一

點是強毅之氣。這兩點造成他廣闊的胸懷，偉大的氣魄，因此吸引了舉國上下各方面的人才。我們看他幕府的人員，無拘文士武將，凡稍具一技之長，可以效力國家者，都能得他的任用；而一般人員，也莫不傾心悅服，竭忠盡智的去幹，就可知他的知人之明，與容人之度了。我覺得曾國藩所以勝過洪楊者，其根本原因，在他這種精神！

第五章 身體的修養

我國號稱不講究體育，其實並不盡然。古者射御毘獵，與後世的拳術，都是鍛鍊身體的工具；不過科學不發達，未能按人體格年齡製成適宜之動作，以普徧於民間耳。又有一部分學者，始終把身體看做精神的產物，認為精神是靈魂，身體是軀殼，精神是主，身體是客，精神是本，身體是末。把精神養得好了，身體自然而然的會強健起來，會享高年；精神養得不好，聲色貨利，功名富貴，得失愛憎之慾，日戕賊乎前，則身體縱極強壯，也受不了內心的如此摧殘。他們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注重清心寡欲，居敬主靜以養神，養性養生之主，意思都是要從根本着手。而自漢以來道教大興，內丹外丹之說，呼吸吐納之功，尤為養生家所樂道，於是凡言體育者，大都離不了精神的修練，可以說這種體育，是靜的運動，是內功。一般人都說這種

工夫有却病延年之效，延年雖未必，却病到是事實。誠然，心身原有最密切的關係，善於憂鬱的人，雖終日運動，恐猶不免於憔悴；心地寬暢的人，雖不十分運動，倒也生氣勃然。這是精神影響於身體，然而掉轉過來，身體亦恆影響於精神，身體羸弱的人，自然多愁多病，體格壯健的人，自然精神飽滿，所以精神與體格，原是表裏一貫，不可或忽的。曾氏修養工夫，即注意此兩方面。前章所述為屬於精神方面者，本章則屬於體格方面者。惟身體修養，畢竟不能與精神修養，分而為二。所以他的養身要言，根源則完全屬於精神方面，末節方法，始屬於體格，而觀效則又屬於精神。茲錄其養身要言如左：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此處重要意義，只在五條正文，所言完全屬於精神方面；然且名曰養身要言，就可知他所認為養身之本，仍屬之精神，至於拿仁義禮智信去配肝肺心腎脾，則又是他受了舊說之累，而為此附會之辭。陰陽家主張以五行之理，支配萬事萬物，所以有五色五味五聲五方五常五藏……之相配屬，此處曾氏所定五項養身要言，在淮南子中，亦嘗如此分配，惟名目次序，往往不同，實則牽強傅會，並無道理。我們竟不必去注意他。然而曾氏所以不脫舊套，猶以此為兢兢者，蓋篤信肝肺心腎脾，與仁義禮智信為表裏一貫，要五臟健康，須得五常之德，為之滋養灌溉，仍是以精神為體格之主的意思。

平常人總是因為自己身體不大好了，然後才講求養生之法；曾氏亦正如此。他的身體很羸弱，失眠，吐血，目疾，癬疥，鬧個不休，這大概一半是先天不足，一半是過於勞苦，過於用功的結果。他自己說？

精神委頓之至，年末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

困。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因之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不保養，是將陷入大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蘖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況我之血氣素虧者乎？以上各條俱見日記

以上幾段，都是他身體衰弱的明證。因此他對養生之法，時時留意，時時研究，遺留下來的，雖至今日，有許多還是價值不磨。他曾說：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這八個字要算他全部養生之綱領。在這個綱領之中，前四字可稱為靜的養生法，後四字可稱為動的養生法。茲先說他靜的一部份。他說：

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窒思慮。

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即妄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

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法亦相通。

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使身不少動而不能。以上各條均見日記

忿慾二字，原來最足以摧殘身體。他嘗說：「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

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淮南子曰：『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精神自今日言

之，忿慾二字，最足以傷損神經，神經受傷，而成疾病，就不是藥石之力，所能奏其效了。中國古代學者，很看

重這一點，所以主張養生莫善於寡欲，誠以欲望無窮，一縱即不可制止，而結果未有不損傷性命者。平常

我們精神妄用於忿慾二字上面者，蓋不知凡幾矣。不必忿怒者，輒忿怒了；不必思慮者，輒思慮了；以至精

神萎靡，神志昏慣，身體羸弱多病，皆由這個惟一的原因。要救濟這個病源，其根本辦法，則爲靜坐。前章已

經說過靜坐在修養上占重要的地位，無論養心養體，都是含靜坐更無下手處。蓋靜坐對於邪念忿慾等，

要算是一個正本清源的救濟；所以凡言修養者，莫不重視靜坐，至少可使神經休息，心志得所韻養，把我

們這營營擾擾憧憧往來的精神，可使得到暫時安慰，是乃最好的調攝方法。前引黃靜軒所說的那幾句

話，就是說靜坐時不要生妄念，若生妄念，隨時就把他鏟除。但是靠什麼東西去知道妄念就是他所謂「

照心。」當我們靜坐的時候，總難免時起妄念，忽然自己感覺妄念在纏繞，這感覺便是照心。把妄念鏟除

去了，胸中空無所有，宛然無思無慮的境界，便是所謂「空心」。但是久染世塵，心氣總不免粗浮，靜坐時往往身體搖動，妄念橫生；此中境界須親自體驗始能深知所以初生的時候，總得有點憑藉，佛教的撞鐘，數佛珠，念阿彌陀佛，泰半是爲的制止雜念，進一步才講到坐禪。曾氏的靜坐數息——數自己的鼻息，我以為也是靜坐初步的辦法。習之稍久，仍以「靜坐凝神，目光內視丹田」爲佳，此中效驗確有却病養性之功。青年曷嘗試之？他曾說：「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却病矣。」這幾句可算他靜的養生法之結論。至於動的養生法，有一部份是承繼他的祖傳，也有一部份是他自己研究出來的。茲引其要言如左：

起早亦養生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早起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早起，二曰勤洗足，似於身體，大有裨益。咸豐十年三月初四日致澄侯沅浦弟

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須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時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

千步。日記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學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間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同治十年十月廿三日致澄侯沅浦弟書

這幾段係散見於他的家書中，故頗有互相重複之處。歸納起來，除前面已述之靜坐懲忿窒欲等外，約有下列數事：(1)早起，(2)眠食有定時，(3)學射有定時，(4)每飯後行三千步，(5)臨睡洗足。這幾件事，即拿現在科學眼光去衡量，也不失為衛生要道。且此數事都不是消極養生法，習射與飯後散步，都是鍛練身體，強健筋骨的積極動作，早起可以去故納新，洗足可以舒暢血液，眠食有時，可以節制勞逸；惟所謂黎明吃白飯一碗，或係湘老如是云云，恐未必真能辦到，即曾氏子孫，似亦未遵行，他更有一個主張，就是有病勿投藥劑，這是他祖父星岡公的家法，不相信醫藥。原來中國有句成語，叫做「不藥得中醫。」意謂吃藥固有時會吃好，也有時會把病吃得更壞了。醫學未明，生命送在庸醫之手者，當然不一而足，所以他只主張平時講求養生之法，而極力反對醫藥，大概他家不用醫藥，至少有三四代，這是他的家風。

自今日視之，他所謂養生之法，都可算平淡無奇，然養生之道，在行之有恆，而不在言之高遠。這幾件事，他可算行之終身，未嘗或輟；且其最大妙用，在利用閑暇時間，飯後散步，臨睡洗足，都不費工夫，而能得

到實益。我們容他所指示的數種，除習射一項，應改成拳術或他種柔軟操法外，都未嘗不可一一仿行。苟能持之以恆，再稍師其靜坐懲忿之意，則養生之道，思過半矣。

如此行去，有什麼功效呢？我們且慢說其高遠，但拿曾氏自己做個標準，就可見其大概了。他身體是如彼的羸弱，然而因為養生之故，在戎馬倥偬之間，勞苦數十年，治軍治民，治家自治，事無鉅細，他都運用心思，更於做事之外，做了許多學問，這已不是常人精力所能勝任；然而以他那種羸弱之軀，行數十年而不倦，就不能不令人驚歎他養生之道的功效了。即以其暮年而論，好像就未見他的衰老之象。他雖然只活六十二歲，但是他竟是無疾端坐而終，這是何等快樂的事？我以為第一就是他清心寡慾的功效，其次就是他日常身體修養的功效。所以他嘗說：

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日記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日記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日記

此處見到他鍛練身體，完全是積極的精神，對自己全無姑息寬縱的態度。平常所謂身體虛弱的人，恐怕就有很大部份是由於自己愛惜太過，保養太過，遇事總是不願多用自己心力，正是所謂將前將却，奄奄無氣，以爲這是保養了，而不知如此下去，愈保養乃愈虛弱，神氣必日沮喪。他所謂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睡覺愈快活，這是他由經驗得來的成績，身體虛弱的人們，最宜取法。

大抵平常器量淺窄的人，稍遇折磨，便會戕賊身心，憂鬱怨尤，疾病乃乘虛而入，這是常人不健康的最大原因。如能胸懷坦夷，則患難憂虞之際，正德業長進之時，身體健康，尙是末事；稍有外感，又何足患？然此等境界，確非易致，聖賢仙佛，所爭都只在這活潑潑的胸襟，坦蕩蕩的意境，而這種胸襟與意境，又不是可以勉強作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他說『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可見學養既到，身體上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種充滿粹潤的表現，不容做作，亦不容隱藏。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見得身體的修養與精神的修養，原屬一貫，二者互爲表裏，未可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第三編 治事

第六章 治事的精神

曾氏生平學問，泰半是從事業上磨練得來的；而事業之所以昭著，則又得力於其學問涵養；二者頗有相互爲用之妙。在他的意思，學問不經事業的磨練，終不能切於實際；事業不經學問的陶鎔，則不學無術，終不能建諸久遠。所以治事的精神，在他整個的學問中，占最大的地位，他生平事業，可分治家、治軍、從政數端，以下將分章詳述，本章先言其治事精神。他所以能在昏庸多忌的滿洲政府之下，以一書生而能削平大亂，位極人臣，使一班親貴，雖欲中傷而無可語者，就因爲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他綜攬東南軍政大權，轉戰數千里，網羅各項人才，而各項人才無大小，莫不心誠悅服，欣然就範者，也是因爲他有這種治事的精神。這種治事的精神，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其價值仍多不朽。

他治事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凡事立有確定規模，規模確定之後，便認定目標向前做去，方法雖變，而規模則始終不變。大概有了規模，不但可以督勵他人，使努力前進；並且可以督勵自己，使勿鬆懈。好逸惡勞，人之恆情，不有一個規模做限制，恐怕任何人都不容易始終不懈。現在各機關，各工廠，都規定做工

時間及其他種種條例，便是所謂規模。故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自己，這規模都是決不可少；不過所謂規模，是不是合乎事實，假如不合乎事實，自己一方面徒是執意孤行，在別人則正人遠去，邪曲阿從，如此不但不成爲規模，並且要因之債事了。曾氏的規模如何呢？他說：

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日記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總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總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修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咸豐七年十月初四致沅浦弟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批牘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

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記

這幾段中看得他主張凡百事務，都應先立定規模，把規模確定了之後，就一心一意的在這規模上求精熟，無論一切阻礙困難成敗毀譽，與夫衆人之喜懼，都聽其自然，不稍改變自己的規模。大概凡百事務的一種規模，就等於海船開駛的方向，辦事主體的人，就是舵工，其他辦事人員，應該在同一規模之下，共同努力，就等於船員與舵工同在一方向上把船向前開駛。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遇着風浪，遇着逆水，都不應該改變他原定的方向，這是辦事的先決問題。他說：「我有可以自立者，」就是指此。他是凡百事務，都有一定規模，治家、治軍、從政、修己……都在這種精神上努力前進。然而他的規模究竟是如何呢？總說一句，就是自反而縮，求慊於心。條分之則可以說在他自己方面，是拿清慎勤三個字做自勵的規模，在辦事方面，則立定遠大與密微兩個規模。遠大就是凡事從大處着想，密微是凡事從細處着手，如是然後才可以不散漫，不顛預，不至毫無條理，而可以行之久遠。然而這幾句話，看起來似乎容易，行起來到有些為難呢？因為凡事莫不有其阻礙與困難，毀譽與成敗，假如意志不堅，心地不坦，器量不大，都不免要變成一紙空文，毫無實際，不然便要流弊百出，至於僨事。此中樞機，只在少數人的胸臆之間，而影響之鉅，有時

竟達乎四海之內；因此我們明白他拿「自反而縮求慊於心」一語，做一切規模的規模，是有至理存焉。他自己是如此了，是不是因此即可以化及部屬，化及全國呢？當然有時也靠不住。那麼怎樣去保全他這個規模，貫徹他這個精神呢？我覺得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常度，這個常度就是貫徹他一切規模的利器。這常度的內容，就我所觀察，可分爲三項：(1)誠拙的態度，(2)宏大的器量，(3)嚴密的考查。這三件事組成他的常度，他終其身未嘗稍變，他的學風，他的辦事規模，他的人生，都建築在這個常度上。怎樣是誠拙的態度呢？他說：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記日

凡辦公事，須視爲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爲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記日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慾，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悻；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亦豈始事時所

及料哉？湘鄉昭忠祠記

卽此數語，已可見得他誠拙的態度。大概規模確立之後，他便誠心求之，虛心處之，無論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他相信只要自己脚根立得穩，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所以他雖歷經靖港之敗，湖口之敗，南昌之困，祁門之困，但是他的常度不稍變，志氣不稍屈，而終成一代中興事業。他自信心是如此的誠篤，希望心是此的遠大，所以視公事如己事，視國事如家事。平常人所以易挾私見，易動客氣，甚至稍稍得意，便趾高氣揚，稍稍失意，便心灰意冷，流於頹廢，我都以爲是器量太淺，缺少自信心，而時時希望取巧的緣故。我們看看曾氏這種誠拙的精神，應增長不少的自信心與勇氣。曾氏所以能如此者，固然是賴有誠篤的自信心與遠大的希望心，但是所以能如此者，却又因爲他有過人的器量，始能容納遠大的希望，始能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的胸懷；不然，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旦妻子歡娛僮僕飽，便心意滿足，不顧其他。這種人要他有多大的抱負，則根本這抱負卽無所容載，這是器量的關係。所以孔子說「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便是說器量褊狹的人，沒有出息。所謂器量宏大，就是要能多所容納，一方面要容納自己最大的抱負，一方面還要容納他人的臧否得失。我們看他所爲昭忠祠記，與他平時的言論主張，處處都見得是要以忠誠爲天下倡，處處要以誠拙精神挽救天下頹風，簡直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概。在他

日記中有這樣一段：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惜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這種器量，是何等偉大！非以聖賢自期者，其孰能之！他既已如此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了，而猶日夜自責，惟恐失於狹隘而不能容物，所以在他日記中又有這樣一段：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尙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卽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這又是何等待人寬而責己嚴。拿這種精神去辦事，還有不成功之理嗎？常人辦事，所以不能順理成章，是因爲未能真正精誠團結，而所以不能精誠團結，莫非惡人之拂逆己意，必欲使天下之人，皆順從我而後始快於心；於是凡不順從我者，皆設法以誅鋤之，其結果則使一世之人，皆鮮廉寡恥，阿附求容，正氣日益消亡，社會日趨下流，而自己亦終不免於權臣之行。故凡擔當天下大事者，必具有能容天下之量，則

人之拂我逆我者，皆可借爲磨厲德行之工具；然自曾氏以後，就未多見了。

器量寬大，並不是鬆懈放任，隨部屬如何辦理，則一切事務都要廢弛了，尙何規模常度之可言？他的個性很嚴肅，又很精細，又不畏煩劇，事無大小，似乎都要經他的考察。他謂治事之法，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爲主。他說：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

三苦口丁寧是也。

見全書雜著二

又曰：蒞事之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日記

此處最見到他治事精神的，就是所謂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照這樣做去，不但自己所經歷的事，不會有絲毫的差錯，卽屬員亦無從鬆懈。這種精神可以說出乎他的天性，也可以說這是維持他辦事規

模的主要因素。所以這種嚴肅的治事精神，他是無時不在。他常說：『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然而他雖是如此的嚴肅，却完全是以事爲主，只求事能辦得好，不是要以苛刻待人，所以察之雖不嫌過多，發之則不宜過驟，務使事體辦好，而人心咸服，非至萬不得已，不輕言罰；然苟一罰，則又不妨其酷，蓋欲儆一以懲百也。他所謂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這是完全以寬厚之心，行嚴肅之政，惟恐自己稍有意氣，稍有粗心，以致考察失實，而誤正事。謹慎如此，誠拙如此，人又焉有不服，焉有不感發興起，戮力從公之理呢？此處我們見得他爲常人所不能及者有兩件事：一是不怕煩劇，一是不存意氣。不怕煩劇，故能遇事周密，不至稍有弛懈；不存意氣，故能一秉至公，而無所恩怨。常人既怕煩劇，故凡事皆多草草，及稍稍潰敗，又復輕動意氣，於是賞罰恩怨，皆不能出於大公，事業之敗，胥由於此。我們看曾氏辦事的精神，先立定了規模，次守之以常度，——誠拙的態度，寬宏的器量，嚴肅的考察，而又繼之以始終不懈的精神，故對事的本身上，是得到知人曉事履險如夷的功效，並且於治事之外，得到作育英才的佳果。何謂知人曉事呢？他說：

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重以

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故。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僞私曖曖，則爲小人，故羣毀羣譽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書札

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見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批臆

此處見得知人曉事之重要。他說知人誠不易學，而曉事則可以黽勉得之。大概所謂曉事者，就是明曉事理之所以然，與事理之所當然，這件事雖然亦非易易，但是歷事既久，經驗漸增，卽是曉事的途徑。至於知人，則非自己的學問涵養識見才能，都有以超過對方的人，則不足以知之，所以這件事不是容易學來的。綜這兩件事可以歸納成一個「識」字。他曾說：『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我以爲知人曉事就是識的註腳，辦事尤其是辦大事的人，假如沒有知人曉事之識，則人之短長，事之是非，都冥然不明於心，處理自是無一是處，縱一秉至公，然事理不明，鮮不失當，將終不免於謬誤。他所謂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也就是識。他的識見能遠大，能深察，便是所謂高明與精明。以高明精明的眼光去知人曉事，自

然人無不知，事無不曉，而每事都可歸於平穩踏實的地位。這兩件事——知人曉事，可算是曾氏生平的特長，而尤其是知人一項，他簡直是神乎其技。許多人被他一見之下，可以察識終身，見其儀表，可以察其內心，更是無從隱秘，不知者以爲他是精於相術，實則是他學問涵養才識閱歷，有過人處，故一入眼簾，卽能知其爲何如人，他生平得力於此者至夥，茲錄薛福成一段如左：

曾國藩知人之鑑，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爲異才。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才，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推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卽奏稱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拔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

這一段是薛氏身歷其事，記述最爲親切。寫他知人之明，可謂透澈無遺，吾人讀薛氏敘曾文正公幕

府賓僚一文，更知他對各項人才，兼收並蓄，而處理得當，使人人得盡所長，莫不死心塌地，竭盡忠忱，固然是他偉大的人格感化力之深，然亦由其英明卓識，超乎常人，使才大者不得不心悅誠服，才小者不敢不死心塌地。曾氏更能量其才器，而任以適當之事，此爲曾氏治事精神上最得力之點。我們驟然看去，總覺得他這知人之明，未免太神奇了，究竟他有什麼神通呢？他用什麼方法去看人呢？現在還是拿他自己的言論來證明，庶乎比較的切實。他說：

觀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尤以習勞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

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季弟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日記

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當使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

以嚴則生憚，防之以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

日記

此處所云觀人之法，自然不能代表他觀人的全體；但是至少可以藉此而知其大概了。在他言論之中，我們可以得知他的觀人標準，只有兩事：一曰操守，二曰志趣。操守是一個人的骨子，所謂爲人之本，以樸實廉介爲主。志趣是一個人格局器量的表現，志趣不遠者，縱有操守，亦不過成爲碌碌自守之士。有了樸實廉介的操守，又有高遠的志趣，再能習苦耐勞，有條理而少大言，自然是上等的人才；其次則志趣高明，而稍欠切實，顧體面而恥居人後，此種人則全恃用之者如何調度，使之心滿意足，勉爲其大，亦往往能於此等人中獲得英才。若遺棄之，或委屈之，則將自傷鬱抑，終於不能自振。所以他主張對這等人，應該略示假借，使自奮發。最壞的是根本無所謂操守，於是乎投機取巧，無所不爲，而志趣亦決不會高遠，總是安於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但計錙銖而已。這等人只好請他做機械工作，使循循於規矩之中。故人才之操守爲最重要，操守是有顛撲不破的認識，有堅忍不拔的精神，有學養，有抱負，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爲威逼，不爲利疚。亂世之士，有此操守者，最爲難得；然真正人才，又必取於此等人中，始能靠住。他用這種觀人之法，又濟之以他自己的學養經歷，所以才力大小賢否智愚，都逃不了他的觀察。凡有一長，均可得用，但是天下那裏有許多人才，爲他察識舉用？到人才不足的時候，又將如何呢？他也很願廣到這一點，所以

他一面自負提擢人才之責，一面又自負作育人材之責。他當時所用的一班人才，何嘗全是已成之才？恐怕大多數還是由他作育成功的呢！薛福成曰：

曾藩國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磨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才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咨，代爲籌畫，別後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桀傲貪詐若李世賢、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見庸齋文集

他作育人材的殷勤誠懇，至於如此，他認定人才是可以由在上者造就成功，而人才又至爲難得，故不敢求備於一人，而凡有一節可用者，即不肯遽爾棄絕。他嘗說：『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原由此可見他自負之大，望才之殷，而不敢絲毫忽略了。他又說：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由勉強磨練而出耳。日記

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無盤根錯節則利器莫由顯著。日記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蚌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日記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日記

這幾段話，與薛福成的言論，正相印證。他作育人才之作用，在與人爲善，取諸人以爲善，此二事是循環相生，人我受益，而其機樞則在君相師儒。質言之，即是靠在上者的提攜造就，則不患天下沒有人才了。他嘗說：『今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原才他覺得所謂無才，是我們自己沒有去造，沒有去求，若能以類相

求，以氣相引，則天下人才，自然聯袂而至，善源不絕，這便要看在勢者作育的精神如何了。平常所謂在勢者，總是會說一句現成話，「天下無才。」實則自己不去作育人才，甚至戕賊天下之才，使一世之人，皆阿附求容，毫無操守，一旦僨事，則咎天下無才，真是「謂之不誣可乎否也！」不知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是由培養激厲而成，必須在勢者求才之心，有「不得不休」之誠，然後人才始樂爲之用。所謂鼓盪斯世之機關，挽回天地之生機，其消息固往往操於一二人之心機。而其主要條件，則在具有大公無我之精神，稍有私心者，卽不能勝；私利固不可，私善亦不可。必真能與人爲善，取諸人以爲善，只在求善，不分人我，如是然後可以作育人才，亦始可以收用人才。苟有所私，則必欲使天下美名美事，盡出於己而後快。事實不能如此，則將害人之善，妬人之才，務使天下之才，盡出己下，於是人才愈絀，世風愈下，所謂在勢者，亦無以自全。當清之中葉，洪楊未起之時，國內情勢，正是如此。滿人竊居高位，妬害漢族人才，無所不用其極，其意欲使整個漢族才能，盡在滿人之下；是以千方百計，防閑妬害，至道光年間，天下人才，真個快銷亡了，而清朝整個江山，亦無以自保。及洪楊變起，全體滿人，皆無辦法，始有肅愼、文慶等力主重用漢人，因得扶此危局，然滿廷宵小，猶自大大不平，故曾國藩初出山時，天下幾乎奄無生氣，由他作育提攜，始獲人才輩出，共挽危局之效。我們看他在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內所描寫當時社會情況，最爲透澈。

人才循循規矩準絕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銖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與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計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實際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這一段描寫當時政象，最爲透澈，稍有才智鋒芒者，都已摧殘殆盡，所能容者，盡是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之徒。質言之，就是一班奴才而已。所以他與彭麗生書，就痛恨道：『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當然了，舉國都是奴才，都是一人一姓的奴才，那裏會產生出攘利不先赴義恐後之人呢？卽有，亦絕無所容呀！在提倡奴才的時代，凡有才智鋒芒者，至少都應該銷聲斂跡，不簡直是無生存之理吧？只有貪饕退縮者，可以驥首上騰，富貴名譽，老健不死。曾氏能見到當時社會病根在此一點，他便盡量在這一點上着力，——提

倡真正人才。我覺得這是曾氏有過人之識，所以能有他那種治事的精神，因而產生出當時的一輩人才，以輔助他事業的成功。

第七章 治家

前章所述曾氏治事的精神，爲其可以代表他的整個人生，故言之不厭其詳。他的治事精神，除開律己之外，第一步便要數到他的治家。他們兄弟五人：曾氏居長，次國潢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甫，季國葆字季洪，他這四個弟弟之中，國潢是留在家中專理家務的，國華、國荃、國葆都由曾氏教導成人，至於顯達。後來國華是死廬州三河之難的，國葆佐國荃解安慶之圍，將迫金陵，積勞病死。國荃攻克金陵，收戡定之大功。他們辦事精神都與乃兄相仿佛。家務雖由澄侯料理，但是我們看他的家書，關於治家之道，教子之方，處處都感覺可爲世法。我們更感覺他在戎馬倥傯之間，萬難集於一身，而對家中瑣屑，猶能如此周密仔細，一方面見得他精力過人，治事的精神無乎不在，一方面也見得他對先世家風，謹守勿失，惟恐以自己地位增高，家中子弟有所仗倚，而流於驕侈，致失家風，遺誤子弟。所以他對治家一事，自己雖不能在家，却無時無刻不在心頭，雖在極忙之時，家信總未嘗或缺，且寫來總是詳詳細細，無微不至。

曾氏先世有很嚴肅的家風，多半是他祖父星岡公所鑄成；星岡公雖未顯達，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規，國藩少時，頗受薰陶，終其身未忘祖父之遺教，而其治事規模，亦大抵與其祖父類似；故嘗斤斤於其祖父已成之家風，而惟恐或失。他嘗說：『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幾不墜家風。』然所謂家風，究竟如何呢？據曾文正公大事紀前面所載星岡公的一段言論，最可見得一般。星岡公之言曰：

吾少耽遊惰，往還鄉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峯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引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飲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攬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祀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姪出就名

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常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

這一段言論，是曾氏家風的創軔，國藩本人的條理規模，及其治家教子，都一本之於此。他與紀澤的信中嘗說道：「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同時又把星岡公治家之法，歸納成「八字」：「三不信。」八字者：早掃考寶書蔬魚豬。他自己解釋道：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鄉里時周

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書、蔬、魚、豬，即讀書、種菜、蓄魚、養豬也。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此可以完全包括星岡公之家法了。原來中國家庭制度，過於龐雜，治家一事，自古爲難，一家之中，老幼賢愚不等，問題乃自此而生。若再拘泥於什麼「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一些老調，這家庭的醜劇與慘劇，便要層出不窮了。故往往有才力很好，事業很好，而家庭無辦法者，實屢見而不一見。曾氏所賴以維持者，大部份就在這固有的家風；因爲既成了一種風氣，而又由主人躬自力行，則一家之中，將認爲天經地義，雖有不肖，不敢侵犯。至於五世同堂，九世同居等話，他雖未公然反對，但是事實上他們兄弟後來都是析居的；因爲這樣才能洽乎人情，而保全恩愛，我們看他的家書，見他們兄弟感情的純篤，處處足使今之有兄弟者，贊歎愧服。然其所以致此者，自然是他們兄弟之中——尤其是居長兄地位的國藩，能躬自勤儉，互相勸勉，然亦因爲先世已有醇厚家風，只須恪遵勿失，即可光其餘緒，然而沒有國藩這樣光前裕後的承嗣精神，爲諸弟先爲一家表，則星岡公之遺範，亦未可知也。茲述曾氏承嗣的規模。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卅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

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我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之素志也。

道光二十九年致四位弟

這一段是他治家的大規模，對父母，對兄弟，對子女，對戚黨，都無微不至；尤其是兄弟之間，愛之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對兒子則惟教之以自立之道，而不蓄積銀錢爲其衣食之需。他曾說：『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因此他治家精神，最主嚴肅。他說：『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

他因爲立誓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所以他爲官十餘年，衣服書籍之外，一無他物，卽此區區，猶擬罷官之後，與兄弟均分。有這種坦白胸懷，自然是無所處而不當。尤其是曾氏先代，並未顯赫，他一朝尊貴，最易改易門楣，墮先人餘緒，而流於驕泰，則子孫淫惰，家道乃自此衰。試看今之爲官者，幾何不是如此？所以在他的治家規模之下，有二大端：一是積極的訓導，一是消極的防止。

關於消極方面者：歸納起來，蓋不出於戒驕，戒奢。大概仕宦子弟，能免此者，確不甚易。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左右前後，趨承奉候者，既無微不至，則其勢必至於驕奢，不知稼穡艱難。故仕宦子弟，猶能勤儉謙和，忘其權勢者，真是絕無而僅有了。然而亦因此之故，仕宦子弟，賢能向上，也很難得；更因此之故，仕宦之家，能維持三代四代，不墮家聲者，亦不多見。而其原因，則莫不由於在勢之時，子弟驕奢淫佚之所致。所以他對這兩件事，真是戰戰兢兢，不敢或忽。他嘗謂：『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因此他日記與家書中，記載戒驕奢之處，不一而足，茲錄數段如左。

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

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日記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致紀澤

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淫佚矣。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諸弟

在這幾段中，他把驕奢淫佚之害，完全歸在一個「驕」字病根上；因爲驕便會奢，便會淫，便會佚，便會無惡不作，而其總因，則又因父兄爲達官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在他意思，子弟不能拾柴收糞，插田蒔禾，便叫做驕；衣食俯拾卽得，卽叫做奢。所以他教子姪，須半耕半讀，不准有半點官氣，不准有輿馬僕從，凡家中一切事務，均須子姪一一爲之，以力戒驕奢怠惰之習。

他除嚴肅教子姪，恪守家風之外，更注意到子姪的婚娶。在舊式家庭中，往往因爲娶得一個不賢之婦，而敗壞家風者；所以他對子女嫁娶，立一個原則，叫做「嫁女必富於我，娶婦必貧於我。」其用意就是要杜絕驕奢。女子嫁到富於我之家，則自己無從驕奢，娶一個貧於我之女子來家爲婦，則亦無從驕奢，而

可安其家風。他說：「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官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當時常南陔想把女兒嫁給他兒子做媳婦，他便始終不願。他說：「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女子有官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因此他婚嫁子女，不許用多金。咸豐九年在江西軍營時，有一段日記云：「已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爲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爲五十姪女嫁事之用。」又崇德老人年譜云：「文正公手諭嫁女贖貲不得過二百金，歐陽太夫人遣嫁四姊時，猶恪秉成法，忠襄公聞而異之，曰：烏有是事？發箱篋而驗之，果信。再三嗟歎，以爲實難敷用，因更贖四百金。」以一個總督婚嫁子女，簡單至於如此，誠不免令人驚異，然而我覺得他是另有深意存焉。大概宦家子弟之驕奢，是乃自然趨勢，所謂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凡所遇之環境，莫不足以長其驕奢氣焰，自非其子弟有過人之質，或其父兄有特達之見，鮮有不爲環境所囿者。相傳某世家子弟，不知民間疾苦爲何事，有人告訴他：「某家沒有飯吃。」他說：「爲什麼不叫廚房開呢？」其人又告訴他：「因爲沒有錢呀！」他說：「爲什麼不到賬房去拿呢？」他自己的環境是廚房開飯，賬房拿錢，於是以爲天下都可如此，尙安望其勤儉守家，憐恤戚黨鄰里之困苦呢？所以戒奢，簡直是他治家教子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必定要這種習氣掃除淨盡，然後才談到積極的誘導。

關於積極方面的訓導，可歸納成功三點：其一是和睦，其二是勤儉，其三是要使家道悠久。茲分別言之如下：所謂和睦，就是要使一家之中，兄弟妯娌雍雍穆穆，然後子孫有法，家道乃昌。他說：『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所以他給澄侯的信中，有這樣一段：

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們得忝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況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和，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家將來氣運之興衰，全恃乎四弟一人之身。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致諸弟

此處因爲他們排行的關係，呼澄侯爲四弟，澄侯始終未出來做事，料理家務的時期最長，故負家庭的責任亦最大。此處責望之重，即是期望之殷。他的大目的，自然是要造成一家之中雍容和霽，而更大的願望，還在使後輩子女有法則。誠然子女完全依照父母的榜樣，形成他自己的性行，父親在兄弟行中，是不和的，其子女亦往往互相怨懟；母親在妯娌行中，是不和的，其女兒嫁到人家，還會鬧出妯娌不和的戲

劇。這雖然不是絕對的因果律，但是至少可以說是有極大的影響。爲什麼呢？就是因爲朝夕薰陶，取法太易呀。調轉過來，假如父母在兄弟妯娌中，是絕對的謙讓爲懷，子女自然亦薰陶成性，而無乖戾之氣；而況他家已有先代遺風，規模極好，只須遵而行之，家風即可不敗，所以他激勵澄侯者，無所不至，就是惟恐兄弟妯娌之間，或因細故而傷情感，則一切治家之道，都無所施了。

其次他所訓導於家庭的，就是勤儉。「勤」字原是他整個治學方法中的骨幹。除了這個字，他的一切治學方法，都成空文；除了這個字，他的畢生事業，亦無由表現。因此他對子姪的訓導，尤注意於此點。據崇德老人年譜云：『同治二年，歐陽太夫人率兒女媳孫自家到安慶督署……僅攜村嫗一人，月給工資八百文，適袁姊有小婢一人，適羅姊則並婢無之，房中粗事亦取辦於母氏房中村嫗，乃於安慶以十餘緡買一婢，爲文正公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轉贈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馭家嚴肅守儉若此。嫂氏及諸姊等梳粧，不敢假手於婢媪也。』故在他的家書中，對於勤儉，總是反覆叮嚀。

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明，則彼此以多爲貴，以奢爲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務要分別用度，力求節省。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諸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七致諸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鍼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余，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致紀澤

這幾段見得他對家庭子姪的習勤習儉，可算無時或忘。以他這樣地位，家中女子，還要洗衣煮飯紡績鍼黹，男子除讀書之外，還要耕種打雜，他說：『子姪除讀書之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又崇德老人年譜云：『同治七年，由湘東下，至江寧，入居新督署，文正公爲余輩定功課單，課單從略云：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矩。自從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又附註云：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健，永不貧賤。』他家庭之風勤儉如此，以視今之官太太少爺小姐，我

們便要爲他子女叫冤了。但是觀他所謂『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終爲患害』則又不禁歎服其爲子女之計深遠，而不忍見其安逸偷惰以致無以自立。孔子云『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曾氏蓋深得孔子之義，是以家庭之間，壹以嚴肅勤儉爲主，皆有深意存焉。

還有一件，可算是他訓導子弟最後目標，也可以說是他治家的當然結果，原可以不須他斤斤注意，然而他却不敢或忽；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氣運，不要由他一世而斬。如何才能達到這個願望呢？則須在勢之時，善自惜福，而又有賢子孫者，庶乎這個願望，不難達到。他說：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延綿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諸弟

居家四敗：——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者，庶有悠久氣象。日記

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度，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致沅浦

悠久氣象，是他治家的最大願望，而時時存現於心目中者，則爲「花未全開月未圓」的現象。有了這個現象在心目中，更有一個求悠久的最後目標，自然不敢想偷安佚樂，富貴驕人，並且還要戰戰兢兢，以此爲戒了。他有這樣深遠的眼光，去維持他那世代相傳的嚴肅家風，故其子孫亦能如其所期，代有聞人，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第八章 治軍

歷史上有一個久懸不決的問題，就是英雄造時勢呢？還是時勢造英雄？我是篤信時勢造英雄的；理由是另一問題，此處所要述的曾國藩治軍，就是一個例證。他是一個純粹的書生，那懂得什麼軍事？他既沒有學習過武備，更談不到什麼軍事學識；然而他卻能領兵數十萬，轉戰數千里，削平縱橫十六省，綿延

十五年的洪楊大難，卒成一代中興事業，把清朝的命運，延長了五六十年之久，固然他本人有許多長處，但是不遭時勢的造就，至少可以決定他不會治軍的。經了時勢的磨練，他便能建此不世之功，這便完全是時勢之賜，便是時代造成的人物。非但曾公，古今賢豪莫不如此。曾氏本人並不長於打仗，所以凡屬他自己臨陣的時候，多半是吃敗仗；但是他所提擢的將官，却都能攻城野戰，疊立大功，並且死心塌地受他指揮。抄句舊話來說：也可以說他是「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所以我們終久不能不佩服他治軍的本領。然而自另一方面說來，他又實在是毫無本領，當他以侍郎資格在籍辦團練的時候，不但舉國上下，未料到他有那樣的收穫，即他自己亦決未想到他能戡此大難，恐怕更有很多人，如滿廷大臣，和當時一種腐化的官僚將士，都要對他們這一起書生表示白眼，或竟冷眼旁觀，等着看他們笑話呢！我們在他批牘上會看見這兩段話：

貴襄辦志趣堅卓，應趁勞乏艱難之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衆人自不敢輕量書生不耐艱苦矣。批劉秉璋函

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必，要之清潔自矢，則衆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志之士，可以勉力爲之，立竿見影者也。聖賢豪傑，豈有種子？大半皆銖積寸累，漸作

而漸近，漸似而漸成耳。批彭椿年呈

在這兩段裏，見到他們初起時的整個情形。在旁觀者總覺一般書生，那裏能耐艱苦？因此便會時時加侮。曾氏這兩段話，固然是勉勵他的部屬，也可以說是他自己時自警惕的衷曲。所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與所謂銖積寸累，漸作而漸近，漸似而漸成，就簡直是他自己為學治事的精神所在。他們就是憑着這副精神，忍辱含垢，咬定牙根，與環境奮鬪，卒雪書生不耐艱苦之恥，而成戡定大功。在他所謂熬過幾次的「熬」字裏面，就可推想他們當時作事的困難重重，與反對派的旁觀譏訕了。這種情形並不是完全因他這兩段話，或者這兩段話中的幾個字句去憑空推測的，我們只要略一考察當時的掌故，就可知道有清中葉將士的腐敗，和他們事業上的荆棘，試看曾氏的書札奏議，和時賢的議論，均不難見到：

兵伍之情狀，各省不同，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鬪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雅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崩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稟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鋼習。曾奏疏

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加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賊，而狠心以仇勝

己之兵勇，其仇勇也，更勝於仇兵。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層見迭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戰股股之際，而各兵不一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其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有聞此營已敗，彼營往救者乎？豈有聞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見曾書札與王鑫書

驅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其入彀。……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圖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粵軍兵將臥耽鳩毒，即無疾病，亦半委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爲？其失二也。胡林翼通

飭修築礮堡啓

當咸道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嶺外，其勢森忽震蕩，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疆臣武臣，但依疲竄，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點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羣羊，咋餒虎，接橋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薛福成

陸建瀛失陷江寧事

這幾段可以寫盡清朝中葉將士的腐敗驕惰，不但助敵造亂，而且善於妬功忌能，國藩他們新興的湘勇，當然在所必忌，妬仇殺之列，觀其所謂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層見疊出，可爲痛心。曾憶胡林翼嘗謂『勝保滿將每戰必敗，每敗必以勝聞。』又謂『勝保在蔣驥殘敗不復能軍，山東人向呼此公爲

敗保。蓋其治軍也，如鄭公子突所謂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舉這一個滿將，可以代表全體的滿將旗兵了。當太平軍定都江寧，琦善和春等所率領的江北大營，與江南大營，算是清廷的主力軍隊，然皆次第爲太平軍殲滅淨盡。當江南大營被殲滅的時候，江北大營早已敗亡，一般人莫不爲清軍憂慮，獨左宗棠聞之嘆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蕩，後來者始得措手。』果然，自江南大營洗蕩之後，政府才死心塌地，信任曾國藩，一班滿洲將吏，也才莫敢誰何，而時局也才有急轉直下之勢。然而曾國藩却能聚集一班書生，轉移全國風氣，我們到不能不研究他治軍的精神，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他雖然是一位書生，但是治起軍來，到不一定是書生面目。他說：『讀書之與用兵，判然兩途。』所以他那些訓練士卒的方術，和臨陣制勝的策略，驟然看去，到不免令人驚異；不過歸根結柢，他那根本精神，則仍是一貫。他感覺當時軍隊，所以抵不住用，其根本原因，就在將驕士惰，他便看定這一個病根，痛下藥石。凡他自己所練的新軍，第一步便要使他生氣勃發，勿有絲毫驕惰之氣。他說：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

謀，自無惰時矣。日記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日記

這可算是他治軍的根本精神，常常提其朝氣，就是一舉一動，都要具有新興氣象，這個新興氣象的總名詞，就是一個「勤」字。他嘗說：「約束弁兵，以勤字爲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處處查察，是曰腳勤；事事體恤，是曰心勤。」批既如此時時以勤字爲念，則所謂爲善惟日不足的氣象，自然無暇吸煙賭博淫侈擾民，凡此諸端，皆由驕惰二字產生。平時如此驕惰，當然談不到訓練，更談不到得民衆的同情與援助。如此一朝遇戰，安得不望風崩潰？所以曾氏治軍的祕訣，在積極方面，惟在一個勤字；在消極方面，則勿驕勿惰。他所謂去其暮氣，提其朝氣，這便是一個易知易行的下手工夫。至於具體的治軍精神，歸納起來，有下列各點：(1) 在主張上能使將士與敵派絕對不並立，即是要將士有澈底打倒敵派主張的敵愾精神。(2) 要在生活上能使將士與敵派絕對不並存，即是要將士有澈底肅清敵派黨徒的攻擊的精神。(3) 要在行動上能使將士與人民打成一片，即是要將士有紀律，不擾民，更進而能與人民合作殺賊。(4) 要軍隊的長官與士兵，官長與官長，士兵與士兵，都有協同動作之精神，即是要軍心不爲敵派所動搖，作戰不爲敵派所各個擊破。參閱陳著胡曾左平亂要旨第四章用這種精神去治軍，軍隊的成績如何呢？他有一個理想：

僕之愚見，以爲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

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賢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與王

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魂魄。自出省以來，日夜思維，目今之急，無逾於此。與文任

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演操，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與張亮

這是他所希望的理想成績；但是這種理想，還能在不如賊匪之舊武弁身上得到嗎？當然只好別樹一幟，改絃更張，庶乎可以馳驅中原，漸望澄清。要想培養出這種成績，其最大培養劑，則在以忠義之氣爲主。有了忠義之氣，自然會一德一心，不擾百姓，而其下手工夫，又必將其暮氣滌淨，朝氣提起，然後才談到

訓練。

訓練最重要之點，便要有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的精神模範。教人不怕死，自己就得先不怕死；教人不愛錢，自己就得先不愛錢；教人不擾民，自己就得先不擾民；教人勝則讓功，敗則相救，樸實勤勞，沉着忍耐，與夫一切精神，爲將士所不可少者，俱得先由本身一一表現出來，然後再訓練他部屬將領，然後再訓練兵勇士卒，如此自然可以煥然一新，馳驅中原。我們看他與各將領的書札批牘，教各將領應具的氣度，句句都見得出於他的肺腑，卽處處見得是他自己身體力行的模範。他嘗對將士說：『營官果能勤以自勵，廉以率下，自可作士氣而服衆心。……我教爾等，卽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過。』批大概凡做領袖，尤其是軍事領袖，假如不能以身作則，欲望羣下確守紀律，不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根本就無紀律可守，卽有，也是病的死的，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他的態度是：

帶勇之人……血性爲主，廉明爲用，三者缺一，若失輓輒，終不能行一步也。

爲將之道，謀勇不可以強幾，廉明二字，則可學而幾也。弁勇之於本官將領，他事尙不深求，惟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衆目眈眈，以此相伺，衆口嘖嘖，以此相譏；惟自處於廉，公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於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得沾潤膏澤，則惠足

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後助勢，某弁迴合力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得廉明二字爲之基，則智信仁勇諸美德，可以積累而漸臻。批吳廷華稟

當營官統領者，有四個不字訣：不要錢、不怕死、不偷懶、不擾民。批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

義血性者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視似四者，終不可恃。

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咸豐七年十月廿七日與致沅浦弟

他平時所與各鎮將領的函牘，及與各將領面晤時所反覆叮嚀者，多不出此類議論。這是他感覺爲將領者應具之氣度，他覺得做大將所最不可少者，就是忠義的血性，而又處處能廉明。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則凡他所講的四個不字訣，與四大端等，均不難相從以俱至。且將領必得具有這副氣度，然後才能感動士卒，才能起士卒之信仰，才能訓練士卒，率領士卒，去與敵人作殊死戰。茲述其訓練士卒之方術。

關於他訓練士卒的規條甚多，大率散見於其雜著批牘書札之中，對於營哨，對於兵士，對於他們起居生活，營房駐紮，出陣攻守，均有一定規章與告誡。兵勇不識字，則製成種種歌詞，如愛民歌、得勝歌、解散

歌、保守平安歌等，都是把軍中最重要的規律，和軍人最重要的天職，用淺顯生動的文字，編成歌曲，使兵士一個個口誦心維，無形中印入腦筋，雖然未必能使一個個人對一句句都發生效力，但是當他擾亂百姓的時候，忽然想到愛民歌，心中總會有點惘然吧！再加上營官哨官，上下一致的用一貫精神去訓練，就不難如所期望了。因此他把訓練事體，看得很重，訓練意義，亦說得至明。他說：『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作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砲子。訓作人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足禦數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批韓進春稟這幾句話可算是他訓練士卒的總綱。其餘散見於他全書中者，更不一而足。茲錄其勸誡營官四條，即可見其訓練士卒的具體辦法之一般了。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營官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煙賭以儆惰。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充足，方能敬慎不敗。洋煙賭博，二

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惰則皆暮氣也。洋煙癮發之人，涕淚交流，遍身難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卽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煙賭始。

三曰勤訓練以禦寇。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爲營官者，得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衆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槍砲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尙廉儉以服衆。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着想。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卽營官好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錢，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先尙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服矣。

這幾條可以代表他訓練士卒之一般方術。生活習慣，行軍技藝，乃至立身爲人之道，都詳細殷勤告誡，而又加上他那知人善任之明，凡部屬不遵照辦理者，便有相當懲戒。以知人善用之明，加之以忠誠惻怛之教諭，再加以公正廉明之賞罰，人非木石，焉有不抒誠向化之理？所以我覺得以一介書生起而治軍，居然治得很好，就是全憑他那副誠拙忠義之氣。禮記大學有兩句話：『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我於曾氏治軍亦云。

他並不是紙上談兵，並不是書生大言，空談誤國的談兵。他是實際臨陣，成敗利鈍在於當前，固非空談理論者可比。我們翻開他的批牘，看他所教諭各將領行軍用兵之道，與批評各將領所以致敗之由，真是「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平時我們意想他那種立身爲人的態度，恐怕定要感覺他用兵總不免呆板，甚致會受敵人誘騙，孰知事乃有大謬不然者。他的臨陣制勝之策略，簡直是靜如處女，動如脫兔，神龍變化，不可方物。當張運蘭失陷牛角嶺的時候，他就說『兵法最忌形見勢緇四字，常宜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賊不能盡窺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知此訣，若常紮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既盡，被賊黨覷破，則勢緇矣，此大忌也。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老湘營昔日之妙處，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紮牛角嶺，已是太呆，正蹈形見勢緇之弊，除夕曾函止之，

十一日五旂失陷後，再以第三旂紮此，則更呆矣。……』大概軍旅之事，宜多實際而少理論，此處所謂形見勢絀，爲兵家大忌，實爲一切戰術之總綱。我們歸納他臨陣制敵的策略，要不出奇以制正，靜以制動。卽此二端，運用靈活起來，便有神龍矯變之妙，茲析言之。

怎樣是奇以制正？就是臨陣制敵而不以常法，所謂出奇制勝，在兵家爲最可貴之策略，而亦最危險之動作。因爲他要以少勝多，以逸勝勞；勝固足以摧敵，敗亦足以爲敵所撲，故非老謀深算，有多數把握時，不宜輕用；然苟以制勝，則又利市百倍也。他說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迫於臨時者也。此可見出奇固足以制勝，然非天機湊合，至穩之兵，至正之道，必不可以輕用。且須深明奇正之義，熟審奇正之形，然後才可運用。他解釋奇正之義，和運用奇兵之法，都很明晰。

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右左兩邊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游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

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日記

老營處孤危之地，則小隊出奇之師，貴少不貴多，貴變不貴常，古人謂之狙擊，明人謂之雕勦，設小隊稍有疏失，而老營仍一塵不驚，斯爲盡善。老營則安如泰山，小隊則動如脫兔。此張運關隘

此處關於奇正之義，解釋至爲明瞭，即運用之機，亦略示端倪；因爲此係兵法奇謀，至爲危險，須臨陣相機行事，非可紙上空談。總之奇兵只可以作一個別動隊，飄忽無常，爲誘敵之計。譬如賭博，欲以少數贏得多數，是即兵家運用奇兵之義。故非看定有可贏之機，不輕投注。於正當營業，則兵家正兵之義，故不可不堅穩鮮明。這是在他全書之中，屢屢叮嚀我們的，就是叫我們要深明奇正之義，而不可輕用奇兵。他主要戰略，還在靜以制動，即是以主制客，奇兵是不輕用，更不常用。不過將領們不可不明奇正之義罷了。因爲他們的敵人太平軍，不是正規的軍隊，部卒多由隨地裹脅而來，聚集甚衆，既無訓練，按太平軍所以到處焚殺此爲主因當然不利於正面衝突；然而內中將官如陳玉成、李秀成、石達開輩，確是一時名將，故不得已而慣用奇兵，不打硬仗，專伺官軍之隙，而不使官軍明其情形。是以有時行蹤非常叢忽，使官軍疲於奔命，有時堅守城壘，使官軍難於攻擊，有時突圍而出，使官軍防不勝防。因此不能不對準這種敵情，而講求特殊的戰略與戰術。敵人是慣用奇兵的，假如官兵也慣用奇兵，老實說官兵是打不過他們那爲目的不擇手段的流寇；

所以曾氏的主張，是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然而對敵人伎倆，却又不可不知，因此我們可以說他這種臨陣制敵的策略，是重在「靜以制動，節節進擊」。靜以制動，就是要能反客爲主，不輕戰，不浪戰，不隨敵人四處追擊，設法使敵人不得不來接戰，而我沉着鎮定以應之。節節進擊，就是在攻擊之中，有防禦的準備，不使爲敵人的奇兵所暗算。這樣的戰略，似乎也太穩健了，但是他們攻擊的精神，還是很厲害，譬如在鄂皖之間，與陳玉成的劇戰，在皖贛之間，與李秀成的劇戰，都是異常猛烈；更如羅澤南、李續賓、多隆阿、鮑超、江忠源輩，都是極勇猛的名將，後來曾氏因爲江羅李諸將因猛攻身死，甚至慘敗，故戒各將領，宜審察敵情，相機戰守。

先安排以待敵之求戰，然後起而應之，乃必勝之道；蓋敵求戰，而我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整遇散，必勝之道也。此意不可拘執，未必全無可採。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發，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祁黠合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

於兩層一無所見，賀然而出。書札

攻城最忌蠻攻。兵法曰：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批

賊若來撲漁亭，我官軍切不可出隊太早，須待各路之賊到齊，看明何路賊多，何路賊少，何路賊強，何路賊弱，何路爲賊之正兵，何路爲賊之伏兵，一一看清，待營中飽吃中飯後，申酉之間，天色將晚，賊久立氣疲，頭目欲戰，衆賊欲歸，然後出隊擊之，必可獲勝，勝後不必遠追，追五六里，整隊還營可也。若賊來太多，則堅守不出。批

此處可算是他的中心戰略，全重以主制客，決不輕舉妄動；所以他嘗叮嚀將士，『必須謀定後戰，切不可蠻攻蠻打，徒傷士卒。』又謂『不輕敵而慎思，不怯戰而穩打。』處處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卽至自己陷至客的地位，亦必須設法反客爲主，苟不深明敵人動靜，寧可不去猛攻，不可浪戰，而至於「雖先發而不能制人」，則將變成反主爲客，正是所謂情見勢絀了。他這種戰略，最爲踏實，尤其是用以制流寇式的太平軍，最爲相宜。此種穩紮穩打的戰略，自湘軍以至於淮軍，都謹守勿失，後來湘淮合軍平捻，更是得力於此。

曾氏戰略，可說是拿主以制客爲體，奇以制正爲用。他的大本營全是正兵，全做成主的地位，遇到適

當機會，才用奇兵，這固然是因敵人之勢而制成這種戰術，然而主將的個性與學養，亦有相當關係。曾氏是極穩健派的學者，我們看他立身爲人，做學問，都是穩健的一路，用兵也仍未脫此本色；所以這種戰略，可以說是因勢制宜，也可以說是出於主帥的一貫精神。

總之他雖不是軍事人才，但是能有此成績，我以為不出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就是他那副誠拙忠義的精神，其次則是就事磨練而成。因爲有他那副誠拙忠義的精神，所以處處能按部就班集思廣益，而得到事實上的美滿結果。能虛心謹慎，在事上磨練，故事的本身，能隨時精進。因爲這兩種精神的作用，所以他雖然是一個外行軍事家，却成功這麼大的事業，並且由今觀之，凡他治軍的精神，和訓練士卒之方術，臨陣制敵之策略，即今世號爲軍事家者，似亦未必過是。其一般原理，雖時過境遷，至於今日，猶有很多地方，未可磨滅。因此我們得到兩個教訓：一是凡事只須拿出真誠忠義之氣去做，不但事可必成，而荆棘且將自去。二是凡人在社會上的成就，無論大小，都是社會培植之功，野心家在那裏妄想做一個造時勢的英雄，是不獨把歷史因果律看倒了，且終必至僨事而不自知。縱觀今古，橫觀世界，都不難得到事實證明。曾公事業，更無論矣。

第九章 治吏

一種政治的設施，應以時勢爲對象，在某種時代和某種形勢之下，宜乎某種政治，這可以說是政治變遷史上的一大原則。因此我們現在要來追述曾國藩整飭吏治的方術，亦必先明白其時代與形勢。然後再看他的政治設施，才能明白其意義。他那時代，可算是清廷政治腐敗達於極點的時期。洪楊一呼而天下騷動，並非洪楊政治有什麼深洽民心之處，實因清廷官吏太壞，人民久不堪命，故一聞洪楊倡亂，而天下莫不浮動。然而洪楊倡亂十五年，蔓延十六省，而卒就剿滅者，則由於洪楊等腦筋中充滿了帝王思想，對於政治設施，毫無新興氣象，若輩所打算者，只在個人之富貴利達，曾未思及民間疾苦，慨然有拯濟之心，而清廷則反由腐敗而漸具生機，故能一舉而蕩平羣寇。是知政治腐敗，乃內亂之媒，政治清明，寇自消滅，一部中國史莫非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什麼是成敗？外面看起，似乎是武力，仔細推敲，還是政治。且專恃武力，終必底於滅亡。項羽、劉邦，便是一個顯例。以曾國藩的時代論，清廷原是異族，雖政治腐敗，天怒人怨，然而得一轉機，猶得延長數十年命運；洪楊爲民族革命者，然而劫殺盜淫，橫征暴斂，民族亦不表同情，可知政治與民心之關係，有如此者！

清廷政治怎樣會有轉機的呢？其唯一原因在曾國藩、胡林翼等的才識過人，看定戡亂之要，首在政治清明，胡林翼嘗謂『吏治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

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者，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又曰：「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選將，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曾國藩曰：「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他們能看到民心向背，在於政治優劣，天下真病，不在軍事而在政治，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斷無挽回之理。曾氏的治吏精神，全基於此。

中國宦途，蓋自明之中葉，已呈腐敗之象，觀宗臣報劉一丈書而知當時宦途黑幕，不減今日。至其末造，則腐敗更甚，官府壞於吏胥，地方壞於鄉紳，滿清承之，既毫無文化，更難言吏治。且妬忌漢人，無所不用其極，故一切政治設施，舉不出明朝胥吏範圍；雖純正潔白之士，一入宦途，卽往往變其氣習，甘與胥吏爲伍，而成或萬惡淵藪的社會。欲潔身自好，只有跳開政治漩渦的一法。因此政治腐敗，官吏貪污，視爲固然。曾氏他們的整飭吏治，很看清這一點，所以極力提拔一班純正潔白的書生，教他們替百姓做些切實的事業；但是書生雖有純潔的長處，却有時因爲閱歷短淺而不通大體，或拘於小而礙於大，或放言高論，而少切實，或……然而他本質是潔白的，氣節是堅強的，操守是高尙的，只須得到相當的磨練，定能做出新氣象的事業來。當時曾國藩主持東南大政，凡所引薦，悉爲書生，他很能運用書生之長，而匡救其短，這是他治吏之特點。因此他的政術，不但是對民設施，並且還要對官訓導。茲就其治吏大端，分正己，戢亂，察吏，

勸學四項述之：

所謂正己者，就是要一班官吏，永久保持自身的純潔，不要因為做了官，便壞了自己的良心。怎樣可以保持自身的純潔呢？我以為他常說的勤儉廉明，最爲中肯。能勤儉自能廉明，能廉明便能做好官，而可永久保持自身的純潔。在他批牘中，對各部屬尤其是各縣令，總是以此義叮嚀囑付。茲錄其與各縣令之批牘數首如左，以見一斑。

該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習氣，尤宜保守初心，無論做至何等大官，終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勵，如天地之陽氣，萬物賴之以發生，否則凋枯矣；如婦女之貞節，衆人因以敬重，否則輕賤矣。批

江縣令周甫文稟

大兵之後，民困未蘇，亦須加意撫循，不可稍涉苛擾，該令以書生初歷仕途，惟儉可以養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語者，是做好官的祕訣，即是做好人的命脈。批盧江縣郭令稟

該令等初到安慶時，本思從容教誡，培成循吏；其後匆匆離皖，此願未償，昨至金陵相見，未改讀書本色，爲之一慰，勤廉二字，係爲政之本，平日必須於此二字認真體會，俾案無片紙積留之牘，室無不可告人之錢，自有一種卓然自立之象。批太平縣知縣蔣山稟

廉明二字是做好官的祕訣，而亦是立身爲人之本。初做官時，未失書生本色，只須能勤即能漸至於明，能儉即可以廉，此二字爲正己之始，循吏之基。這兩句話可算他自守教人的基本原理。誠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爲民上者一舉一動，既爲民所觀瞻，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惡之流行，亦速於置郵而傳命。曾氏嘗曰：「風氣之正否，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記曰古人居高位所以戰戰兢兢，不敢或懈，所謂「若朽索之馭六馬，」都是看透自己的責任重大，己身不正，卽「是播其惡於衆也，」其害何可勝言？所以政治好壞的先決問題，端在官吏本身的純正與否。所以他說：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記曰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絕。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

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記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次青好爲愈恆之謙，啓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日記

凡治大事，以員少爲妙，少則薪資較省，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擇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濫竽其間；少則各項頭緒悉在二三人心中，不至叢雜遺忘，多則反是。總之爲事擇人，則心公而事舉，爲人謀事，則心私而事廢。該局冗員稍多，以後大小事件，須有專責，一一吹竽，則漸有起色矣。批江寧萬壽司啓琛等稟

凡此皆所謂求在己者也。爲政不能如此，卽難有清明之望。不與，不終，不勝，可謂從政人員之極則，無論大小地位，都應該如此。質言之，就是凡居領導地位，均須具此三端，事的本身才能做好。不過「不勝」「不終」他都解釋得很清楚，並且舉有例證了。「不與」的意義如何呢？我以爲就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不與」。「不與」就是「不有」，不有其功，不有其位，都是「不與」的意義。怎樣就是「與」呢？就是自有其功，自有其位。做皇帝就以天下爲私產，做官吏卽以官位爲私有，似乎有了地位，就等於賺得一份產業，應享有特種權利，而自忘其義務。處處表現自己是有權威的，是應該高人一等的，這便叫做與。

叫做有。居高位者只要有了這層觀念，那麼一切設施，都不會適當。縱有一二釣名沽譽之事，似乎是出於愛民，然究竟是藉以為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與真心愛民者，終是兩事。且必有「不與」的精神，才談得到不終不勝之義，不然，視天下為私有，既不對任何人負責，更何須不終不勝呢？故必視官位與己毫無交涉，然後才是真心替百姓做事，才會有「恐其不終」、「恐其不勝」之意，亦才談到得人治事之方法。故我嘗以為凡做一切的領袖，都先要有「不與」的觀念，才能以事為主，而不以個人私見為主。這然後自然會虛心下問，勤儉廉明，日求正己之道，以求免於顛危。有了這個基本觀念，然後如有才力不足之處，由人指導，才可以虛受。至於胸懷器量，固然有許多是生成偉大，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亦有並非生成偉器，而可以借學問淬勵，事業磨練，使漸練漸進，以至於不與的境界。此處他所謂為政之道，與萬藩司之批，我以為都是砥礪屬員正己的方法，亦即借以磨練胸懷的工具；即與李次青所定的約法五章，雖然是對個人有為而發，然內容所及，亦確為一般官吏最易犯之事實。他且勿論，即所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試問居高位者，有幾人真能如此！不能如此，即是己身之不正矣，更何能談到正人！

他那時所謂政治，多半是軍事之後的設施，更有許多是軍事甫息，匪患未絕，地方官不但要有政治長才，並且還要有剿匪能力。即不然，亦須竭力輔助軍人，安良除暴。質而言之，在他的理想，能合當時的情

況，最好是將能兼吏，吏能兼將，所以他對將官說的話，與對文吏說的話，其基本意義，頗皆相似。薛福成曰：『曾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爲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曾國藩集思廣益，手定章程，期爲行之經久，勸農課桑，修文興教，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官場浮惰之習，亦爲之一變。』觀此可知他的治軍治吏，心目中中原無區域。不過一個是衝鋒陷陣，攻城奪壘，一個是整頓後方，與民休息。二者原是一氣相連，無可間斷，所不同者，武將重在戰術，文吏重在治道，而安良除暴，則又二者之共同目標，故其對官吏有這樣的兩段話：

土匪橫行，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已。批牘

告訐之脅從，概從寬宥，以絕誅累誣叛之風。訪獲之頭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治脅從則有黨必散，治頭目則有犯必懲。外寬內嚴，恩威並用，不過數月，必有大效。批牘

這兩段都是說當時官吏應該負起戢亂的責任。只要於百姓有實利，即自己受禍，亦所不計。蓋「治亂國，用重典」，彼時彼地的官吏，不如此即不足以安多數之良民，且不能澈底戢亂。即有任何優良政治，

亦無從設施；故此時官吏，應先負起戢亂之責，然後才談到政治措施。

曾氏的理想，是要自己訓練出一班書生本色的循吏，使他們去負戢暴安民的責任，以收拾民心，與民更始。但是如何能使這個理想不落空，而可以成爲事實呢？便要看他那種嚴密而敦厚的察吏方法了。薛福成嘗述曾氏察吏之法，謂「其法於蒞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考語，開摺彙進，以備校覈，一面留心察訪，俾有所聞，卽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真。俟賢否昭然，具疏舉劾，闔省驚以爲神，官民至今稱頌。曾國藩未嘗專講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積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這足見得他察吏方法，嚴密如此。然而他並不是苛刻，他的嚴密，完全是對事，不是對人。所以對事是嚴密了，對人還是敦厚。這是如何說法呢？就是說對事的本身非常嚴密，一步不放鬆；但是訓導培養吏材，則又極寬厚慈祥之至。可以說他的察吏方法，一半是留心訪察，一半是訓導培養。因此他的屬吏，賢者益自奮勵，不肖者亦能自勉。關於考察情形，在第六章中及此處所引薛福成的言論，可以得其大概，惟是前所言者，大抵偏於嚴肅的一方面，實則嚴肅之中，處處帶慈祥之意。看下面兩段，便可知了。

稽察屬員，宜如父兄之教子弟，先之以訓誡，繼之以嚴飭，不可遽存疾視之心，致成隔膜。如有不服教誨，怙終不悛，及實干貪酷六法之員，則立挂彈章，不必問參員心服與否，更不宜聽揚言而自形憤懣。

也。批安臬
司稟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
諸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

記日

這是何等剴切慈祥的態度？我們看他的書札與批牘，處處見得他有這副氣象。誠如父兄之教子弟，
業師之教生徒，只有期望，而無疾視；更因各人才質行徑，而予以相當的訓誡與鼓勵。譬如對陳國瑞則戒
以「不擾民，不私鬪，不梗令。」對鮑超則教以小心大度。他說：『小心者戒驕矜，戒怠忽，卽前此所謂花未
全開月未圓也。大度者，不與人爭利，雖辦得掀天揭地事業，而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矣。』其他一
切屬員，都時時予以這樣的訓練。他曾手訂勸誡淺語十六條，當時印成小冊，分散部屬，考察的時候，卽以
此爲標準。十六條中，有四條是勸誡營官的，已見於上章。還有十二條則勸誡州縣者四條，勸誡委員者四
條，勸誡紳士者四條，茲錄其大綱如左：

勸誡州縣四條原註云：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訟。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四日崇儉樸以養廉。

勸誡委員四條：

原註云向無額缺現有一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勞以盡職。二曰崇儉約以養廉。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四曰却傲惰以正俗。

勸誡紳士四條：

原註云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二曰崇廉讓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務

實。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此十二條中，每條之下，都有詳細的說明，與前所錄勸誡營官者相等。茲為節省篇幅起見，錄其大綱，然已可見其概要。凡他所勸誡者，事事皆由他本身做起，部屬未能完全遵照者，則殷殷勸導之；其才力不足，發生事實上困難者，則設法輔助之；其有因公死事者，則優予撫恤，以勵廉吏。如此訓誡激勵，恩威並用，故能不數年間，風氣大變，此可見其訓練之功矣。

還有一事，在他政術中佔重要地位者，厥維勸學。勸學之方向有二：一為勸官吏學，一為勸地方人士學。勸學的目標亦有二：一曰勵人才，二曰厚風俗。誠然，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假如沒有學習研究的心志，則無論所司何事，都不會有多少進展。當然學習研究不一定要在書本上鑽尋，但是完全沒有拿書本的興趣，甚至鄙視書生，則亦談不到虛心研究，使自己才能有所進步。故就官吏說，要想自己才能日益廣大，至少要有一付學習研究的心志。就一地方說，假如地方人士，都不好學，勢必一方之人，皆粗野鄙陋，而風

俗亦必致日益澆漓。故勸官吏學，則人才日出；勸地方人士學，則風俗日厚；是爲事實上必然之結果。這兩方面是有連環性的，所以他同時並教，使一般官吏都能於公務之餘，潛心向學，庶不致不學無術而爲禍國殃民之事；使一方人士都能潛心向學，不但可以厚風俗，且可擢人才，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在上者擢而用之耳。茲先述其勸官吏學者如左：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曰吏，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釐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勸誠委員
第三條

閑暇則讀書習字，深思力行，總不使此身此心，有一刻之怠惰。並與楊參將互相規勸，以勤勞二字爲主，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無得自暴自棄也。批江紹
華稟

才力不逮，不必引以爲歉。凡才力得之天稟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據。厲志以廣之，苦學以踐之，才力無不日長者。水之漸也，盈科而進；木之漸也，積時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漸而已矣。此吳廷
華稟

我在第一章中，即曾說明曾氏把學字意義看的很廣，舉天地間一切事物，莫非是學。此處他舉出軍吏、餉、文四端，係專對將吏委員之言。教他們就本身職務擇一講究，以求深造，並告訴他們講究之道，不外學問二字，更將學問二字，分析得如此明瞭透澈，娓娓動聽，只要能够勤苦耐勞，自可日即高明。且由勤苦耐勞中得來的學問，到是腳踏實地，銖積寸累，最靠得住，他所謂才力得之人，事者乃可據，便是指此。所以我說官吏如能潛心向學，對個人則才能日進，對社會則人才日增。其勸地方人士者，又如何呢？他說：

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士紳。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力，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頹，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即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為宗族所信，睦婣為親黨所信者，是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為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為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牧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宅，或延致

來省，賜以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跡，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因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直隸清訟事宜第十條獎勵人才變易風俗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所謂學者，初非限於讀書，六德六行六藝，莫非是學。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果在上者真能以學行自勵，對士民又能勸導獎進，無微不至，士民未有不望風而化，寢以成俗。苟在上者自己不正，不學無術，則部屬將吏亦必以類相從，頑鈍無恥，龔詬無節，其結果將使一世之人皆知非阿諛諂媚，苟合取容，則無以自存。如是而猶望風俗敦厚，而不流於卑污苟賤，何由得乎？縱在上者，時時以禮樂教化爲口頭禪，而欲掩飾時人之耳目，亦徒見其心勞日絀而已。故我以爲曾氏所以能指揮部下將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聽從，其最大原因，就是他本身有學問，足以服衆。他是一切言行舉動，足以爲部屬士民之法，而又時時以勵人才厚風俗爲職志，部屬士民尙安有不從之理？且如他求賢的路徑，分爲三科，則凡士民之有一行之善，一技之長，均有以自見。如此不但使天下賢士無懷才不遇

之憾，而正氣既伸，姦宄斂跡，所謂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鷓鴣不逐而自逃。真是勵人才厚風俗之根本大計。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邪正之互爲消長，乃千古以來無法避免之事實。居高位者既不可不清此點，而爲之輔翼獎勵，使正氣得伸，姦宄斂跡，更不可不自檢點本身言行，務使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俱足以風民而服衆，庶乎言顧行，行顧言，而無出爾反爾之災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曾氏之言行不遠，患在不以爲則耳！

第四編 讀書

第十章 讀書的先決問題

平常人總會以為做學問就是讀書，書讀好了，就會有官做，做得官了，則富貴利達，乃至聲色貨利，都會源源而來。故曰：『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此可見一般人對於讀書的觀念，而讀書一事，所以會佔整個學問的領域，也無非為此。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做學問就是讀書，讀書可以升官發財。這句話固然不能包括過去現在的一切學者，但確是一般讀書人的普遍心理。故讀書這件事，在社會上的確看的很重要，然而讀書人愈多，社會國家只有弄得愈糟，尋根究柢，不能不歸結到讀書的目標問題。彼其以「顏如玉」「黃金屋」為讀書目標，當然時時刻刻，對目標以追求，人人如是，社會尙堪問耶？

曾氏數十年來，雖在戎馬倥傯之中，而讀書為文不輟，其教生徒，教子弟之讀書方法，尤能親切踏實，而為後進入學之門。不過他不是主張讀死書的，更不是拿讀書做尋求官階的工具。他以為讀書是做學問的一部份，而做學問的目標，應在「化民成俗。」他那個時代士氣頹喪，讀書人除帖括詩賦之外，已不

知何爲學問；除欲得舉人進士之外，已無所謂志向。所以他是一心一意想挽回這個頹風，先由自己本身做起，然後由近及遠，以造成一個良好風氣，正風俗而救人心。雖然事體甚大，但是他相信只要有一部份人，在那裏真能以身作則，真心倡導傳播，則亦未嘗不可以「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他說：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嬗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如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可知此事雖然甚大，只要去做，效果到也無難。故曰：『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他又說：『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做官，何以異哉？』因此我們知道要想做「化民成俗」的事業，固然不可以不讀書，但是專讀死書，是不會「化民成俗」的，雖不讀死書而無遠大的志願，也不能「化民成俗」的；所以他認爲讀書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要「志大人之學。」他說：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工夫，志大人之學。日記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

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硬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閔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以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卽以余生平言之，卅歲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卽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紀澤

凡此都是志大人之學之事。所謂大人之學，這裏也說得很具體，民胞物與之量，內聖外王之業，使匹夫匹婦，皆得其所，所謂悲天命而閔人窮，這是何等盛德大業？豈是讀書求官之輩所能夢見？又豈終日佔畢，吟唔於詩賦帖括者所能望其項背？然而同一讀書，或彼或此，便是所謂堅卓之志的作用。凡人讀書，莫不有志，志大人之學者，固謂之志，卽志在升官發財，詩賦帖括者，亦何嘗不日夜孜孜，求達其志？故在讀書之始，假如不把志向定得正大，則其流毒將不堪聞問。記得是張蒿庵說的吧，『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所謂一日之志，我以爲就是學者讀書爲學之初，自己所期於自己者，是若何趨

向，若何願望。這便叫一日之志。這種趨向，若在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呢。那麼不得志到算是天有眼，一經得志，便要地無皮了。假如趨向在民胞物與，悲天閔人呢。則所謂得志與民同之，不得志修身俟於世。無論在上在下，都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才算是學者正經，讀書亦才有用，且亦才需要讀書。有了這種志願，雖自己氣質稍下，亦可藉讀書以改變。並不是書籍有這大力量；不然古今讀書人都應入聖賢之域了，又何以大奸巨猾，往往滿腹文章呢？就可見書要看什麼人讀：大奸巨猾，則書中所載，莫非爲其奸猾之資；以民胞物與爲懷者，則聖賢之言，皆我之言，書中之事，皆份內事，自然會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不如周公者，而求其所以爲舜爲周公者。孜孜矻矻，朝乾夕惕，則未有不能達其願望者。而其得力處，則在自己有堅卓之志。所以說立志就是換骨之金丹。然而所謂立志，又不是或作或輟，一暴十寒所能奏效，必朝斯夕斯，抱定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然後才能毋望其速成，毋誘於勢利。所以他常在立志之下，加「有恆」二字，意謂始終不懈的精神，乃讀書第二個先決問題。他說：

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見識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

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諸弟書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廿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廿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精進，況六弟七弟上等之資乎？……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書，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諸弟函

此處他不但把有恆的效用說得很詳盡，並且做出有恆的樣，爲他諸弟們規畫出有恆的方案，這方案，不但他的諸弟可以受益，即我們現在還是可以依此做去。他所舉有志有識有恆，自然都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不過「有識」不是初學所可驟幾，所以他平常教人，總是以立志有恆爲最要。然而我以為果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恆，時時不斷的與古人爲儔，當然會知道學問無盡，不致以一得自足。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所慮者就是立志未必堅定，見左右前後，與我相彷彿者，皆得與

援而騰達了，於是自己也就耐不過了，或望其速成，或誘於勢利，或竟棄其所學而另覓蹊徑，都叫做無志，都叫做無恆，就會不免於河伯觀海，井蛙窺天了。他寫此信，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時候，也可以說正是他發憤立志，發憤持恆的時候。我們看他幾個月內，做了許多功課，我們或者會驚疑他是天才獨厚吧？其實不是，絕不是，他的資質，並不過人，他惟一長處，就是他那副誠拙的精神，因知勉行的精神，孳孳不懈，無稍間斷的精神。每日看廿頁書，並不算是難事，然而我們就不能有他那樣成績，便是因為我們缺少他那副有恆的精神。假如我們也立定志向，要持之以恆，每日看廿頁書，幾個月後，成績也定可觀。而況年年如此，終身如此，何患無所精進？荀子曰：『無冥冥之事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曾氏此時正是勵志潛修，冥冥惛惛的時期；凡他後來那些昭昭之明，赫赫之功，都是這時候做成的基礎。即他諸弟後日功業，也很得力此時的乃兄教導。故凡有志於盛德大業者，不可不立定堅卓的志向，尤不可不持之以無稍間斷的恆心！

有了堅卓的志向，不斷的恆心，然後感覺自己理不充，識不遠，才不足以應用，那麼可以談讀書問題了。這時候去讀書，才是正當的需要，才不至於藉書中之義以濟其私而滿其慾。即就讀書本身來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其了解力，運用力，都必較茫無目標者，為強且大；不過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

能盡飲也。其中萬徑千蹊，莫知所適，在讀書之前，苟不指以正當途徑，則將以羊腸爲大道，以斷港絕潢爲終南捷徑，則將皓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故在立志有恆兩問題決定之後，還要辨明應該採取什麼趨向，這可算是讀書第三個先決問題。他關於這個問題在全書中說的最多，茲就其告直隸士子者，略述如左：

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世，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俱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

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這一段話拿現在目光驟然看去，或要覺得有些迂腐了吧？其實所謂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難道不是萬古不變之真理？難道不是人類應有的基本行為？普通人或因環境關係，教育關係，而未能完全如此，讀書負先知先覺之責者，當然應該以此為急務。蓋自一般腐儒，以規行矩步坐尸立齋種種形式，自矜為義理之學，而其心術有時乃不堪聞問，於是義理二字，變成迂腐虛偽之名詞，提及義理二字，或者就會引起人們聯想到那種迂拘腐朽的形態，實在這不是義理之過，假義理以欺世盜名者之過。義理的內容，就是立身為人之道，成己成物之方，至於用何方式以立身為人，以成己成物，則儘可隨時代以變遷，隨環境以變遷，要其歸則始於正己，終於濟世，如百川異派，同達於海而已。初不必拘於一定方式，一定途徑。他所謂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昔人所謂學有本源，便是指此。有了這個本源，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所謂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紙簡而不差；則天下無往而非學，無事而非學了。到此時，雖曰六經皆我註腳，亦無不可。

以上所舉這三個先決問題，他全書之中，並未這樣明白的告訴我們；不過在他言論中歸納起來，可以得到這三點是讀書應有的先決問題。我以為此事於讀書為學之始，關係極大，故於其讀書方法之先，

述此章以爲冠，是否鄧書燕說，則不暇問了。

第十一章 讀書方法

觀察一個人的讀書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讀書興趣和其造詣的淺深。這句話固然未可當做絕對的標準，但是大致是無甚差誤的。從前塾師教小學生死讀大學中庸一類深奧的書，並教以先要安詳恭敬，張橫渠語不從，則臨之以夏楚，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學生，乃視讀書爲畏途。這是方法影響到他的讀書興趣。因爲沒有良好的方法，而書又不可不讀，於是有一些學者盡量的死讀書，讀死書，到頭童齒豁，而數百字時文，乃有未通順者，或讀書數十百卷，而無一句足資應用者，都算是方法下的犧牲品。曾氏爲時代所限，積習所限，其所舉讀書方法，當然與現代教育理論猶未免於差池，然而踏實誠拙，是其天性，由是踏實誠拙之天性，乃產生他實事求是的讀書方法。蓋讀書最忌取巧，取巧固有時可以得到書中一知半解的皮毛，若想求深造，求本原，求前人未發之祕，皆絕對不能存絲毫取巧之心。不但不能取巧，凡學術造詣愈深者，恆用力愈拙。西人往往爲發明一理論，不惜窮畢生之力以求證據，必待數十百千證據都相同了。然後才敢自信。清朝漢學大師，亦嘗爲一字一義，而求數百證據。在聰明人看起來，不是太拙了嗎？而不知他的造

詣，即從這拙中得來。許多聰明人而異常淺薄，就是因為不願用這拙的功夫。而況書中趣味，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深者得深，淺者得淺，精蘊之處，全要自己求得，才為己有。父兄師友拿他自己心得來告訴我們，固亦可以啓示一二，然究竟與我自己得來者，是兩樣意味。然則讀書可以不用方法了？是又不然。方法好像是指示我們一個方向，告訴我們這方向的道路，有什麼河溪，有什麼山谷，應該坐車，或應該坐船？至於路上風景的如何美觀，便要你自己去看才能親切。方法又如鑛師告訴我們鑛苗的所在，與開掘的方法，我們雖然明白了何處有金鑛，何處有銀鑛，亦且明白了怎樣開掘的方法，然而實行去開掘，便非我們自力不可。至於採獲多少，更須視我們用力如何，與毅力如何，方能決定。現在青年有太重視方法，而忽於自己的實力，對學問不願下苦工，成就安能不薄？而其最大原因，則在專欲取巧。我所取於曾氏讀書法者，就為他這種腳踏實地毫無取巧的精神。至其所舉應讀的書籍，自然有許多已受時代的汰除，但是他的方法，却最足以給我們仿效，我們當然不能去其精華，而求其糟粕。

他的讀書方法可以分四項說明：(1)看、讀、寫、作，(2)專精一業，(3)求明瞭勿求強記，(4)分類筆錄。怎樣叫看、讀、寫、作呢？他說：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書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

衷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蘇黃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卅後則長進極難……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矣。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舟次樵舍下與紀澤函

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

這可算是讀書方法的初步。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四者的界說與效益，他都言之綦詳。四者之中，除寫字一門，現在不甚注意外，其他三項今日爲學之士，仍不可偏廢；尤其是讀書與看書，他說的最爲透澈。蓋讀書意在求熟，看書意在求速，熟然後可以專精，速然後可以廣博。學而須先有若干部爛熟之書在胸中，然後再去涉獵羣書，方無阻礙。此如爲將官者，自己手練精兵若干萬人，赴湯蹈火，略無難色，然後以

此若干萬人爲主，協同其他新練之兵，攻城略地；則不但手練精兵無往不利，即新練之兵亦將無往不利。讀書有書，亦正如此。學者苟有若干部爛熟而又深澈了解之書在胸中，然後看書自可以速，且易於了解。現在青年對於熟讀一事，恆視爲畏途，不要說整部書不能讀熟，即學校幾篇國文講義，要希望他們讀熟，都不是容易的事。胸中連幾篇熟文章都沒有，更那裏能談得到看書？即看書亦如何能深澈了解？又如何能作得出清晰明暢的文章？就我的經驗：看書作文，都要以胸中熟書多寡爲標準，不先注意熟讀，乃欲做成好文章，或求看書之速，是皆緣木求魚之事。我是篤信初步爲學必須熟讀的人，看書作文，都須以熟讀爲根基。當然不是一切作品，都要熟讀，但是其重要者確非熟讀不可。不能全讀者，則須多看，所謂不多看則太陋也。我以爲讀書最好分三部：1 熟讀之部，2 常看之部，3 涉獵之部。常看者就是不止看一次，涉獵者一眼看過，得其大意即足。

曾聞前輩先生云：曾氏最講讀法，聲調神態，均極入妙。證之他自己的言論，尤覺此言之足信。他曾告訴其子紀澤云：『爾欲作五古七古，須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在他日記中，亦曾說到『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

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在這兩小節中，我們幾乎可以聽到他那鏗然如出金石的书聲了。尤透澈的，就是他所謂高聲朗誦，密咏恬吟，相習既久，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豈但作詩是如此？作文亦何獨不然！初學爲文，往往字句生硬，或上氣不接下氣，都是未能常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己之喉舌相習的緣故。所以我覺得這一段雖然說的是看讀寫作四種，除了寫字一門，其餘三者，我以爲讀是一個綱領。

其次便要專精一業。他嘗說：「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在他聖哲畫像記那一篇中，亦力言廣心博鶩之病，而主專攻一學，所以他教子弟，總是以專精爲主。他說：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若志在窮經，則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兼營競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書

讀書之道，有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

「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

函

大概貪多而不務，得原是青年最易犯之病狀，在已有看書能力的時候，常會泛濫無邊的亂翻亂看，無系統，無中心目標，這樣看去，終不會有精蘊的心得，終其身亦難有專長。猶如自己手裏沒有精銳之士，所部盡新募之兵，當然指揮不靈，而不能有一定趨向。曾氏所謂專一經，專一史，絕不是教人除此一書之

外，不閱他書，他屢屢叫人要多看書，謂不多看則太陋。此所謂專，就是要求精之意，欲求精必須專，專有二義：一謂專藝，二謂專心。專藝就是專一經或專一史，或專攻其他任何一書，均謂之專，但須研尋其義理，考證其名物。如練兵然，必練成可以赴湯火蹈白刃者，始謂之精。經則專主一經，史則專熟一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把一部書研究得精通爛熟，甚至終身以此一書為研究之中心，是之謂專。他認為專字是讀書一個祕訣，故除專藝之外，還要專心。怎樣專心呢？就是拿全副精神，專注在一種書上，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他說：『讀昌黎集則覺天地間除昌黎集外，更無他書。』這真是最精澈的祕訣。現在學校之中，要說終日沈潛於一書，自是不可能之事實；但是取法他的意思，用全副精神去看書，還是可能的。雖只看書一小時，就在這一小時內，聚精會神，忘却書外的一切，這是應有的習慣；至於一本未完，斷斷不換他書，也是我們應該取法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最怕的就是遇着難關，便自拋去；則不但不能專業，更談不到專心。所以他在專字訣後，又加一個耐字訣。大概這兩個字，是不能拆開的，因為無論何種書籍，總有相當的困難，定要勝過這種困難，才能前進；假如稍遇困難，即便丟去，則根本即談不到看書，更遑論專業？所以他叫人要耐。我覺得遇難關固然要耐，遇興趣缺乏之處，亦須要耐。因為一種書的內容，優劣不一定與興趣成正比例，有時理

論愈深，興趣猶愈減少，必待用力鑽研之後，興趣才由勝過難關中，盎然而出，這是耐的收穫。現在一般人遇稍難之書不願看，份量稍大者亦不願看，都是缺乏耐性的表現；而現在作品，總是份量不甚多，內容充滿刺激性者，也就是爲要迎合這種缺乏耐性的弱點。我以爲每一種書，在未看之先，宜稍審慎，不合意者儘可不看，既看則無論若何困難，若何無興趣，均須看到底爲止，一書不完，決不更換他書，縱或內容未必皆精，亦宜耐着性子看完，然後才知道書內的好處在那裏，壞處在那裏，能知得書中壞處所在，雖未得益，也就算是得益了。

有一個問題爲一般人最易發生者，就是書已看了，記不得，奈何呢？與其記不得，還不等於不看嗎？這句話說的有點似是而非。看書記不得的原因，大概是自己對於某項根基太淺，而驟看較深之書，當然不容易記得；然而雖不容易記得，看了一遍自己腦筋中却已留下一個無形的印象，到將來再看相類的書籍，就比看第一本時容易多了。所以不能說記不得，就等於不看。關於這個問題，曾氏有深切著明的解釋。他說：

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然記得矣。

咸豐九年六月十日與紀澤書

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咸豐五年五月二十

六致諸弟函

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咸豐五年正月

十八日致諸弟函

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也。凡求強記者，尙有好名之心，橫互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致

諸弟函

平常所謂讀書記不得者，大概是因爲走馬看花，並未把內容看得明白；假如把內容理論看清楚了，條理看清楚了，不求過速，亦不停止，自然會得到書中趣味。他所謂寸心若有怡悅之境，真是閱歷之言。這個境界是我們個人經歷過的，不過未深注意罷了。我們回想看到一種透澈淋漓的議論，一字一句，皆

能入人心坎，幾乎句句爲我心中所欲言，而又句句爲我所說不出來者，當此之時，我們心中的滋味如何？就我的經驗來說，就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假如看書能常得到這種境界，則萬無不記得之理，更無須乎強記。這是教育心理學中所謂理解記憶法。還有許多機械語句，如何去記呢？曾氏的意思，是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時時翻閱，常在眼中經過自然可以在不知不覺間記得。最壞的是蠻讀蠻記，這樣在兒童便要戕賊其天性，愈讀而愈蠢；成人亦將殘害其身體，終亦不能多記。他說凡求強記者，有好名人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這是因爲太不自然的原故。我覺看書最重要者，應在看的時候，把內容弄明白了，不必存心去求記，遇到重要的地方，拿起筆來，加他幾個圈點，或者加些符號在字句旁邊，或把重要句子提在書眉上，或把自己意見批在書眉上，都可使腦筋中多留些書的印象。有人說一種書多看幾遍，不就可以記得了嗎？固然，一本書看了一遍，連着再看一遍，時間既較經濟，效力且更加大，方法自亦不錯；不過我覺與其把同一書本多看幾遍，到不如將同樣性質而不同樣的書本，多看幾種，興趣可以不枯，效力仍可加大。譬如看中國史，第一遍看的是甲編的，第二遍最好是找一本乙編的本子來看。如此既可比較，又等復習，興趣比專抱一個本子濃厚多了。這是我個人平時閱歷如此，不知別人亦如此否。

還有一事，爲讀書時應注意者，就是不要把書籍看得太寶貴了。書上不輕動一筆，寫一字，外表看來

似乎是最壞的事。我覺看書應充分的動筆，涉獵之書不必如此凡與本書有關係者，一律抄到書上，不足，再用筭記本字，這是前輩先生所重視之事，而亦研究學問之不二法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曲園羣經評議，諸子評議，孫詒讓扎迻，……都不過這項工作的擴大而已。所以無論研究什麼學問，讀書筆記，總是少不了的。曾氏嘗恨自己生平寫字遲鈍，抄錄筭記不多，引爲大憾，故時時以此事教導子弟。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筭記，仿顧亭林王念孫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筭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寢得甘，此外別無所求矣。咸豐九年四月二日致紀澤函

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爾曾看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學問之捷徑也。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致紀澤函

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鈔之法。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者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致紀澤書

中國學術素乏精密的科學系統，學者初入其門，如入百戲場中，千變萬態，應接不遑；才智之士，把自己讀書心得寫出來，或把經史等書拆散了，再依其性質分爲若干類，如淵鑑類函等都不過是讀書之時，爲便於自己翻閱，但是及其成功，乃爲極有價值的類書，與極有價值的讀書笥記，可爲後學者學問捷徑。然此又非必大學問家始能爲此，凡讀書人都能爲之；惟不必急求發表罷了。趙翼、王念孫、俞曲園、孫詒讓諸人，當他筆錄的時候，何嘗念及傳諸後世？蓋讀書之士，既莫不有其心得，即莫不應有其讀書筆記。他說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鈔之法。他這幾句話很有科學方法的思想，可惜他自己軍務少暇，未能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這是他自己抱憾的地方，亦是我們以爲可惜的事。不過他指我們這個分類筆錄的道路，總是不錯的。只是有一點應清楚的，就是他那時所謂分類筆錄，大都是爲文章詞藻，爲奪取科名之要道。現在爲學，科目繁多，當然無暇及此，然與自己性情相近的學科，乃應備有讀書筆記，或卡片，或活葉鈔本，或固定鈔本，要隨時隨地，逐處留心，凡與自己歡喜研究的那門學科有關係，足

以補吾研究之資料者，無論古書今書，報章雜誌，名人演講，雖一鱗一爪，都應把他錄在本子上面。研究學問應有一個「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的精神。縱或有些材料不甚精萃，亦可供相當的參考。這種工作，說小一點，可以補充書本之不足，而便於閱覽，說大一點，則大學問家，大著述家的搜集材料，都不出此途。所以我嘗覺得讀書最重要者，就是筆不能懶。

以上所述讀書方法，可以說是四個步驟，可以說是四種研究學問的方法。爲學之初，看讀寫作缺一不可，次則宜就自己所喜悅者，擇一藝以求專精；然又不可局於一隅，以至於太陋，故須多方閱讀，閱讀有得，隨手筆之，此所謂四個步驟。四者之中，以專精一業爲中心，看讀寫作是專精一業以前的事，閱讀爲廣求所專之業之補助材料，筆錄亦是以所專精者爲中心，這是就表面次序說如此。實際亦並不是有一定的封域，專精一業時，並不是拋棄了看讀寫作，分類筆錄等，更不是拋棄了前面那三項工作。故自初學的第一次第言，似乎是四個步驟，自研究的中心言，則此四者，乃是四種方法，缺一不可。

讀書是學問路道之一，做學問當然不是死讀書；但是不讀書亦不足以言學問。且如本書所述曾氏之學，其大者曰修養，曰治事，似乎皆非書本上事，然若完全拋棄了書本，則其修養者，必不至有如此健全而所治之事，恐不能如此細大不捐，羣下從風向善。他以一匹夫而轉變一代風氣，第一是他以身作則的

精神過人，第二是他研究有素的學識過人，有此二者，故一言一動，皆足以服當世人心。我覺得他爲官數十年，處處是以學術化人，人格感人，從未憑藉他的勢位，任意宰割人民，強人民以從己，這是最使我們愴然仰慕的事！

曾國藩治學方法終

標商無註

